

Helmut Thomä

Qijia Shi

Horst Kächele

精神分析实践（英文版）

精神分析治疗教科书（德文版）

现代精神分析（俄文版）

--中文版--（待选）

本书合作者:

Andreas Bilger    Manfred Cierpka    Hans-Joachim Grünzig

Roderich Hohage    Lisbeth Klöß    Julian Christopher Kübler

Lisbeth Neudert    Rainer Schors    Hartmut Schrenk

Brigitte Thomä

中文版翻译者:

谭钧文    李航    周肖榕

## 1. 原理

### 1. 精神分析：现状

#### 1.1 我们的处境

本书内容将频繁且详细地谈及Freud的著述。因此，我们将在精神分析框架内，以概述对其工作的理解和我们通常的处境为开始。广泛的引用Freud的著述基于几个目的。最重要的是：尽管在系统化方面有一些卓越的努力，但是当今的真理依然是：“通过追踪其起源和发展来理解精神分析，仍然是最好的方式”(Freud 1923a, p.235)。对经典文本的消化是理解当前精神分析中的问题和寻找现代解决方案的先决条件。

在本卷中，我们旨在创立一个*历史导向的精神分析系统描述*。我们追寻滋养精神分析的小溪之源，采用引证的方法来揭示当前观点的发展轨迹。因此，段落引用的方式将贯穿始终：我们在与Freud的立场不经意的交互过程中来奠基和维护我们的观点。在Freud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几十年来以不同形式重复出现，这见证了精神分析的开放：“它……在经验的帮助下摸索前进，总是不完善并且时刻准备着纠正或修改其理论”(Freud 1923a, p.253)。它的坚实基础隐藏于下面三段：

在精神分析中，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治疗与研究之间不可分割的纽带*。知识带来治疗的成功。不学习新的东西不可能治好病人；不吸收有用的新结果不可能获得新的洞察力。我们的分析过程是唯一的——在这个过程中这种结合是明确的。只有通过实施分析性的*牧师工作 (pastoral work)*，我们才能加深对人类思

维的理解。这种科学收益的前景是分析工作最骄傲和最愉快的特征。(1927a, p.256)

在对治疗师自尊的帮助上，短期内具有积极结果的分析是有价值的，并使精神分析医学重要性 (*medical importance*) 得以体现；但是，对于科学知识的进步，它们大部分仍然是微不足道的。从它们身上学不到什么新的东西。事实上，他们仅仅是如此快速的成功，因为他们对成功所必须的一切已了如指掌。一些新的东西只能从当前非常困难的分析中获得，为了攻克这些困难的分析，你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我们成功分析的案例中，只有下到最底和最原始的心理发展层面，才能从这里获得此后形成问题的解决方案。后来，我们感觉到，严格地说，只有渗透如此之远才能称之为分析。(1918b, p. 10)

我已经告诉你，精神分析始于一种治疗方法；但是我不想把它作为你感兴趣的治疗方法来解释，而是解释它所包含的真相；解释它给我们传递的信息，这些信息是大多数人类关注的——他们自己的本质；以及解释它揭示的联系，这种联系存在于人类活动之间的巨大差异中。诚然，作为众多治疗方法中的一种，它是当仁不让的佼佼者。如果没有治疗价值，如其曾经的那样，它将不可能在与病人之间的联系中被发现，也不会经历三十多年的发展。(1933a, pp. 156-157)

如这些段落所讲，Freud为经典建筑画了一个蓝图，可是，这将永远不能完成——并不是仅仅因为每个分析师在每一个分析中发现建筑材料，即使之前使用过的，而是作为一个原则性问题。

## 治疗和科学

在上面这些段落传达出的三个基本原理中，包含了因果理解治疗的核心元素。Freud没有松动对这不可分割的联系的支持。分析师

不能满足于仅仅是治疗的成功。他想要解释精神障碍的起源，尤其是找到它们是如何在治疗中变化的——或者它们为什么没有变化。失败总是代表着巨大的挑战(K□chele 1984)。可以断言，在治疗和研究之间有着不可分的联系，这就要求起源和改变的决定因素，以及那些治疗中的失败，组成科学研究的对象。诚然，对Freud来说，关于治疗的有益效果，以病人和分析师的评价来满足他自己是大可接受的，但是按照精神分析治疗的结构危机，我们现在必须客观的测试这种效果。在我们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个当前的趋势问题——可能因为“循证医学”口号而大打折扣 (Sackett et al. 1996)，而更是一个理论和实践之间互相联系的基本问题。与流行的对主体间极端的限制相比，这种主体间极端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辨明，常常是根据叙述的事实，问题是关于精神分析治疗理论所宣称的有效性。如果这不被纳入考虑，那么每个分析性治疗都可以被说成是研究。在线研究—— U.Moser (1991)创造的词——已经作手合适陈述的问题(Thom□ & K□chele 1992, 卷2, 第1章)。

精神分析超越了症状为导向的暗示疗法。不尝试解释和不努力从获得的特殊材料中去得出一般结论，这将等于重新陷入纯粹的实用主义或者“一个无限的实验过程” (Freud 1933 a, p. 153)。Freud表达了这样的忧虑：“治疗将……摧毁科学” (1927 a, p.254)。他认为严格的(不偏倚的)调查研究和治疗规则为重建病人最早记忆提供了最好的科学条件，并且对健忘的揭露为治疗创造了理想条件(1919e, p. 183)。我们现在知道，领悟这不可分的联系需要放弃野蛮的暗示并坚守标准的治

疗准则。Freud甚至坚持为每个独立分析场景中的改变创造最有利的情景，例如：他意识到需要病人导向的灵活性(1910d, p. 145)。非倾向性的、科学的、治疗的精神分析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从一开始就在那里了。因为将近一个世纪非倾向性的和无目的紧密联系实际上已经是正统思考的试金石或陈词滥调（shibboleth）。

Freud在其它文本中使用了术语“shibboleth”（1914d, p.101; 1923b, p.239; 1933a, p.6）。我们想要提醒你的是其原始圣经的意义。士师记十二第五节描述了，42,000个Ephramites是因何被溺死在约旦河，由于他们当地的方言不能正确的发“shibboleth”这个词的音，而发“sibboleth”代替，如此做的结果是当他们试图离开故土时，使他们自己成为了围攻者的敌人。

这种看法仅是最近才被Sandler和Dreher (1996)揭示，并证明是自欺欺人。这不仅对治疗的效果有负面的影响。在这场运动中，不屈服于这种自欺欺人的精神分析师们被认为是异己而不受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欢迎（IPA）。只有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时精神分析人士--Heinz Kohut建立了自体心理学，这是一个激进的重塑，在北美精神分析中，作为一个可选的思想学派，为这已经长期存在的理论和治疗多元化找到了接纳之处。在1981年在蒙特利尔举行的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会议上，Wallerstein 以其论文“一个或多个精神分析”开启了一场辩论，并在两年后的罗马，表达了他对这些争论中的“共同点”的坚信 (Wallerstein 1988, 1990)。从那以后，对共识的渴求可在任何地方感觉到。不是通过实证调查方法来检验这惹人注意的摩擦和分歧，而是通

过引用创始人Freud来推断一个实际的和谐共识<sup>1</sup>。

治疗情境的创造是获得潜意识精神连接的先决条件。Freud低估了论证治疗改变和澄清疗效因子（the curative factors）的科学价值。他在某处写道：“精神分析不是公正的科学调查，而是治疗手段。它的本质不是证明任何东西，而仅仅是改变某些东西。”（1909b, p. 104）。

从最开始，病原取向的研究和治疗取向的研究已经有不可分地联系了。我们强烈认为这种尝试已经失败了。在治疗过程中，许多关于障碍原因（病原论）的问题仍然不可回答。这不是被事实否定，这个事实阐明了自传背景可能有有利的治疗效用。通过把过去纳入考虑，暂时性被严肃对待，没有它就没有现在或将来的概念。这种联系加深了对Fonagy (1999)和Blum (1999)之间关于记忆恢复角色作为治疗因素的争论的理解。在我们看来，Fonagy的夸张评论--“记忆恢复是精神改变过程所附带的”没有被充分地解决(Fonagy等，2003)。

自从1936年在玛丽亚温泉市召开的会议以来，治疗研究已经开始着手过程与结果的区别以及二者关系的研究 (Bibring 1937)。研究者

---

<sup>1</sup> 关于数以千计的精神分析师的整合，他们原本不是在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受训并属于其它的专业协会，但是现在寻求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会员身份，这一定会被认为--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证据表明他们的资质没有差别，在获得准许之前必须以额外的督导或重做精神分析训练来补充。伤自尊的准入仪式不能确切的帮助他们克服这些未经实证证明的质量差异。如此的准入仪式，以德国精神分析协会（DPV）会员申请为例，申请一样是主考官在评估标准的基础上实施，这些评估标准实际上并不特别而仅仅是内在地理解。在我们看来，部分德国精神分析协会会员想要回到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怀抱的愿望也应该被精神分析性地审查。杰出的德国精神分析协会会员准备经历进一步的训练，而不是为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提供他们的技术。

证明，众多的因素对治疗过程产生影响，并被整合进一个一般模型，这个模型也融入了对精神分析治疗起关键作用的元素(Orlinsky等，2004)。要特别考虑，发生在精神分析治疗开始和最后之间的改变证据以及它们与长期存在因素的关系。如已经谈及的，Freud的优先是因果关系的证明，但是，我们不得不批评Freud的是，他没有充分地区分短期和长期因果关系。我们认为长期因果关系是精神分析所依靠的原则，这也使精神分析区别于暗示疗法。

现代研究对治疗的主要关注是：展示在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改变的发生，并且澄清这些改变和分析师追随的理论之间的关系。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不得不解决很多问题。对于Freud建立的因果 (causal) 联系有优先权，这是经典精神分析被创立和区分暗示疗法的原理。

Freud在因斯布鲁克医学院（Innsbruck Faculty of Medicine）提供的Halsmann案例的专家观点中讨论了这个原理(1931 d)。Philipp Halsmann被指控谋杀父亲，辩护律师辩护Halsmann没有责任，引用俄狄浦斯情节作为减罪因素。因此，这种观点--俄狄浦斯情节和□父嫌疑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要被澄清。Freud阐明：“这种行为的原因与‘俄狄浦斯情节’相去甚远。确切地说，因为它始终存在，所有俄狄浦斯情节都不适合在犯罪问题上提供决策” (1931 d, p. 252,). 在这个案例中，□父行为可能被另一个行为或症状所取代。此外，如果基于如此一元观点的病理系统被二元系统（two-class system）--俄狄浦斯vs前俄狄浦斯所取代，那么，反而增加了有辨识力的（特殊的）解释。Freud用下面的轶事阐明他的观点：

这里有一个盗窃案例。一个携有铁撬棍的人被裁定有罪。在给与判决之后，被询问是否有什么想说的，他请求同时被判通奸罪—因为他身上也正带着实施这种行为的工具(1931d, p. 252)。

如此久远的因果关系远不及神学中人类失去天恩这个神话。正如其所宣称的那样，这世界上的弊病可以通过在一两个领域中制造改变而治愈，一个强大的魔力通过这个思想--精神障碍有标准的俄狄浦斯或前俄狄浦斯病源--被施加，并且在这个思想中，有一个关于关系和解释两个不同方向的治疗(Cremerius 1979)。这个思想相当于具有最早期和最强大致病因素的最底层，这似乎就解释了一切。

支撑某种障碍的因素，我们所说的短期因果关系，还没有被充分地考虑。作为一个从长期因果关系向此时此刻的短期因果关系的转变（基于过去的潜意识冲突），治疗关系的精神分析性意义代表精神分析的操作化。只有在精神分析中，过去和现在的连接才被如此强烈地谈及。相比之下，在行为治疗中谈及的社会化仅仅是空谈(Margraf 2000a,b)。

在各种学派各自的标准名称中，当他们不能提供或者甚至不能尝试提供必要的证据，或者选择性地视其已经提供的时候，这些学派就违反了经典方法的中心思想。

如果尝试将我们上面引用的那三段中的信条转化为实践，那么精神分析就始终处于建构之下。先前获得的知识必须不断地被测试。深



入到最深的、致病的层级的渗透一定会被那些当前问题的解决方法所检测，反过来，这些问题也取决于根深蒂固的致病因素。

### **治疗持续时间和成功的关系**

可以从Freud的论文推断：保持在熟悉领地的进程比那些开辟新领地的进程更快速。分析师精湛的技术使得与其知识、能力和经历进行有意义的沟通，这一定更加导致治疗的加速。当成功被预见和实现，分析师和病人的自尊得以增强。确实，许多短程治疗--就持续时间和会谈次数方面而言，是否获得长期的改变，并且因此不能仅仅是考虑症状的治愈或移情治愈。可是，特别对现在，在短期内导致良好结果的分析没有太多价值，并且对增加分析师的声望来说，几乎不被计算在内。如Leichsenring等人 (2004)和Shedler (2010)在权威期刊上撰述的那样，考虑到短程精神动力学心理治疗（最多大概达到50次）的积极结果，这非常不令人满意。趋势是分析质量与它持续时间联系非常相关，尽管这是另一方面的事情--获取的知识是否符合治疗和理论的标准。

### **纯粹的解释**

Freud的著作可以在不同的方法中引用。不可忽视的是，在治疗和科学思考中，Freud被这种思想所引导，即，某一天可以排除所有其它影响并达到纯粹的解释。在与Loewenstein (1958)的争论中，Eissler (1958)辩护称，这种乌托邦似的纯粹解释将会解决大量实践和理论的问题，并且也很难抵抗它的魅力。如果经验不能教给我们更好

的方式,那么我们也乐于与之前行。在这种背景下, Freud(1919a, p. 162) 质疑是否足以使被压抑的内容意识化并揭示阻抗:“我们是把阻抗留给病人独自处理还是给他指出来?除了他从移情中获得刺激之外,我们不能给他别的帮助?”我们可能容易产生这些问题,但是Freud自己的另一个问题排除了我们觉得需要如此做的感觉:“我们应该以另一种方式-通过把他推入最有利于解决冲突的心理状态-来帮助他,这难道不是看起来很自然的事情?”

从标准技术的角度来看,进一步考虑分析情境的结构是不必要的。据称,遵从为识别冲突的潜意识元素创造理想条件的原则已然放弃。既然如此,在第一个阶段,通过灵活建构分析情境对适合分析的病人的额外帮助将是多余的,因为外在框架-分析频次、躺椅运用等等-已经证明了其价值是如此令人信服,以致批判性的复议显得多余。可是,事实上,精神分析解释的艺术,这个核心技术,是依靠很多因素,对其忽视将限制精神分析方法的理论力量和治疗效果(Schachter & Kächele, 2007)。这些曾经被忽略的条件,现在很快变得流行起来,近年来,第一次出现是在波士顿改变过程研究小组的“某些东西超过解释概念”中,该研究深受婴儿发展领域的卓越专家--Daniel Stern的影响(Stern等, 1998)。执业分析师们显然会一下认同这个概念。因为这正是每天“一起前进”的治疗现实和支撑我们职业的稀少的“会面时刻”。

## 修正

Freud推崇的精神分析方法的多样性已经到处体现，在单个病人或典型的病人小组情境中，努力去适应这种方法。然而，标准技术的尺度变得越来越狭窄，病人寻求合适的方法，这方法的灵活运用并加以修正使得精神分析治疗广泛运用。标准技术使得选择性方法成为一种指示，病人不得不调整他自己去适应这个方法。而修正技术允许适应性情境暗示 (Baumann, 1981)—治疗被改变而去适合于病人。这重建了对治疗的全面理解，并且应该有利于所有年龄段和有着广泛精神和心身疾病的病人。平均寿命的增加也引起作精神分析的病人不超过中年这个限制标准的松动，这个限制标准为Freud所推荐，但是，在1920年被Abraham质疑。精神分析方法适应性标准在年长者中的应用与精神分析治疗的扩展携手并进：在对精神和心身疾病的发病机理的理解中，每个生命阶段（青少年、成年、中年、老年）的典型危机和冲突与他们的本应是重要的、伴随童年早期的危机和冲突一致(Erikson 1959; Greenspan和Pollock 1980a, b, 1981; Lidz 1968; Brazelton & Cramer 1991)。尤其是在老年病人中，适应性指示涉及精神分析技术的修正(Radebold 1994, 1997, Pollock & Greenspan 1998)。如我们将在第6.6节详细描述的那样，在一些国家，Freud的预料被实现，来自所有阶层的病人都热衷于精神分析治疗带来的好处(Kutter 1992, 1995)。

## 经典主义思想

经典科学理论不是古迹，也不应该被给予保护而适应这个遗迹。

Valenstein (1979)不可能在韦伯斯特词典 ( Webster's Dictionary ) 给定的“经典”意义的帮助下， 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经典”精神分析的定义， 并且给予论证。为何如此呢？ 根据韦伯斯特词典提供的其中一个定义， 一个完备和公认的理论、方法， 或思想主体， 当其观点中新的发展或基本改变缩小了其有效领域， 通常可以被描述为“经典的”。 第二种定义同样有启发意义。回想起来， 各种形式或系统被称之为“经典的”， 与后来的修正或更基本的起源相比， 只在某段时间内保持可信性和有效性。按照Freud本人提及的“经典的”方法， 仅仅在释梦的背景下——在回溯和相当偶然的方式——也提到了修正， 这种定义是有趣的。除了使做梦者对梦里分离的各部分做出联想的经典方法之外， 各种各样的其它可能也被开放(1933a, p. 11)。比如， 我们可以“引导做梦者开始通过寻找梦里的‘日间残余’， ..... 如果跟随这些结构， 我们常常在一击之下获得转变--从似乎遥不可及的梦的世界到达病人的真实世界”。

再者， 术语“经典治疗技术”并不是源于Freud， 而是在介绍修正时才第一次使用。Ferenczi对给予经典治疗技术这个名字起了辅助作用。他的革新被著名分析师--包括Freud的反应所扰， 这种革新为了治疗目的而对经验的评级高于记忆， 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他正后悔回到“我们的经典技术” (Thomä, 1983 a)。因此，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诞生了一个术语， 该术语被用于描述治疗上不能满足于对记忆的偏爱和智力重建(Ferenczi和Rank, 1924)。无论什么形式， 经典技术可能假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 它忠诚的坚守其起源： 它面对背离茁壮成

长，这种背离不为有明确界定标准的实证研究所支持。通常，与任何称之为“经典”类似的赞美是一种阻碍，阻碍了对其扮演的角色进行研究，该种角色扮演于经典的和新的类型元素在治疗技术的持续发展。新经典 (*neoclassical*) 类型不以创新著称，而是特别正统的坚持外在定义的规则(Stone, 1981 a)。

Freud的经典工作和任何运用之间有着强烈的张力。这种张力以存在于理论和实践关系中的问题为特征，我们将在第十章讨论。技术的实践应用难以表达Freud的中心思想，或甚至与它们的发展背道而驰，如果根据他们自己的需要而遵循规则，如果规则的功能不被持续的测试，那么这样的危险将尤其巨大。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区分这些术语：“经典的”，“新经典的”，“正统的”等等。因为在经典释梦方法中，Freud发现没有找到证据来标注行为过程，那么，在规则的运用中，我们本身将放弃谈及经典技术和内容而专注于标准(Will, 2001)。

### 标准治疗技术原则

尽管Freud的经典著作总是以某些形式在各个分析师的思想中得以表达，却不能以某种方式转化进治疗中，这种方式可能证明经典技术说法是正确的。但是，完全有必要遵守和使原则标准化。这些治疗的原则可回归到Freud的推荐和忠告上来，关注于技术，并将这些原则整合进标准技术中。在处于某种情境（歇斯底里症、恐怖症、强迫神经症、某种身心疾病状态等等）的病人或接受精神分析的个人的利益中，治疗和理论的考虑必然导致原则系统的变化和修正。另一方面，在正统的技术中，这些原则的便利是毋庸置疑的。并且，在病人严格

遵守这些原则的基础上，适合分析的病人被筛选出来。在另一个极端就是野蛮精神分析 (*wild psychoanalysis*)，这始于有缺陷的根本偏差，这种偏差始于适度可靠标准，终于最原始的心理失常和混乱(Freud, 1910k)。然而，尽管其有违反治疗的衍生后果，现在，“野蛮”分析也值得区别考虑(Schafer, 1985)。

越来越多的出版物涉及Freud的实践(Beigler, 1975; Cremerius 1981b; Kanzer和Glenn 1980)，这促进了对精神分析治疗技术历史的批判性重评。但是，当有必要给病人提供食物、贷款，或甚至给予金钱的时候，现代问题解决方案无法在单纯认同于Freud的本能和人道主义行为中发现。移情理论的外延已经引导分析师特别注意分析关系的不同方面及其解释。我们认为，当今比以前更加有义务严格遵守Freud在《答外行分析师问》后记中提出的要求(1927 a, p. 257)。在后记中，他强调所有的实践应用应该有助于心理概念自身和朝向科学的精神分析。在相同领域，除了使用其它方法，对研究发现应该给予适当的考虑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非理论的应用，科学的精神分析取决于跨学科的合作。(见Cavell, 1993; Paul, 2005; Schorsky, 1980)。

类似地，在心理治疗过程和结果的研究中，治疗分析师不能忽略当代的研究方法(Lambert, 2004)。关键问题是，科学的精神分析的区别和特征是什么。如一本精神分析治疗书籍的作者所说，在各自的领域中，我们可以把它留给各自领域的学者们来决定哪一个精神分析方法的实践应用对宗教和文化历史、神话、文学，满足于科学的精神分析的标准和各自的原理。在精神分析方法的治疗应用中，是什么构成

科学精神分析的问题，可以参考在本章开头引用的Freud的三个基本论断来回答。越严格的规则被放弃，越少它们对治疗的影响被科学的调查，建立正统说法的危险也越大。很显然，正统说法不可被科学方法调和。

因为这些原因，我们简单谈及“精神分析技术”或简称为“分析技术”。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这些年来标准化了的原则。实用主义和科学的活动是规则导向的。因为，放下“某物是如何产生的”原则 (Habermas, 1981, 卷.2 第31页)，它们对精神分析现象的影响以及在精神分析过程中的发生，一定时常在脑海中产生。如果经典精神分析方法没有危险，这些方法等同于外在规则，那么我们不必犹豫使用“经典技术”一词，因为在我们听来，太“经典的”声音好于“标准的”。从我们某些辛勤评论中，这应该足够清晰了，没有容易的方式去保持治疗技术的理性传统和继续其自我批评的范式。从某物是如何产生的观点来考虑治疗作用，责任在于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应用这些原则的人。不能被认为Freud的推荐和忠告是永不可改变的原则，特别是当没有可以从外在特征推断出令人信服的阐释的时候。

## 1.2 精神分析师的贡献

这三册的主题是*分析师的对治疗过程的贡献*应该是关注的焦点。我们从这个观点出发系统地检查所有的方面——见诸行动、推行、移情、阻抗。在治疗情景中，分析师影响着每个感受或观察到的现象。

## 互动模式

治疗进程依赖于分析师施加的影响。自然地，也有其它因素的影响，比如这些决定进程和确实某种疾病的存在、导致疾病发生的环境，以及此时此刻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常常促进和增强治疗进程。在如此条件下，非常明确地是分析师有机会施加治疗影响，原始退化的精神疾患在这种新体验的情形下实现改变。分析师既受影响，又专业性参与进这二元过程，因此，这自然谈及到治疗性的有效互动。为了全面地描述治疗进程，一个互动模式在三入心理学（three-person psychology）的基础上被孕育(Rickman, 1957; Balint, 1968)<sup>2</sup>。

在人际关系普通心理学的基础上看俄狄浦斯冲突，这第三方总是存在于当下，即使不是实际上的存在。第三方潜在的存在从其它所有二人关系中区分了分析情境。在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中，围绕第三方的推论从来没有任何受到充分的考虑。在分析情境中异乎寻常的剥离，可能不仅仅鼓励幻想，而且极大地影响它们的内容。为此，精神分析理论的比较，必须始终考虑各自的治疗技术。第三方（父亲、母亲或同伴）如何成对出现，这可以更加精确的称之为“三减一”，以及这双人组如何认为它们自己是一组（或不是），根本上取决于分析师。在治疗过程中，除不可避免的同伴冲突之外，某些冲突被三减一所特

---

<sup>2</sup> 值得注意的是，与第一册出版同时期(德语版,1985;英语版, 1987)，关系主体间精神分析快速发展，起初主要是通过IPV之外的美国威廉姆斯·阿兰森·怀特学院成员(Mitchell 1988)。在德国，关系互动模式的发展，极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教科书-“乌尔姆教科书”的结果。



有的问题定义（第六章）。

### 创立治疗情境

为了真实的理解治疗过程中发生了什么的，我们必须检查分析师的行为和他对*创造和维护治疗情境*所作的贡献。根据Modell (1984a)，这种由Balint在1950年建立的程序性要求并不令人满意，已然被忘记。至少，在大多数案例报告中，分析师的部分——他所作所思以及他选择解释的背后——都没有足够的描述。因此，与Freud一致，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病人有最可能的条件去解决他们的冲突，识别潜意识源头，并因此摆脱症状）坚持认为治疗师的任务是建立治疗情境，这并不是一个夸大治疗雄心的表现。因此，我们注意到分析师必须施以意义深远的影响。病人的自由不是被限制，而是被扩大，因为他被鼓励参加关键性讨论。

从是否帮助或妨碍自我觉知和*问题解决*的观点来看，每一个原则都要被考虑到，并且分析师不应该不情愿伺机做出改变。因此，变得清晰起来的是，我们不视精神分析技术的理论和原则为圣经。相反，原则对治疗的影响一定要深入*每个案例*。我们偏爱问题导向的方法，这种方法远离了墨守成规的“菜谱”模式。比如，在*自由联想*将会自然开始的信仰下，分析师不再开出根本法则这个药方，不被其它因素影响。除了期望的效果外，所有标准化的努力也可能有不可预料的积极或消极本性的副作用，这种本性促进或妨碍治疗的进程。

## 治疗方向

在他的诊断和治疗活动中，分析师把他自己导向系统化的心理（病理）冲突。Kris (1975 [1947], p.6) 把精神分析描述为“人的行为被视为冲突”的研究。在科学的历史上，Binswanger (1955 [1920])已经视这为精神分析范式，这种科学体现在Freud无可抗拒地简单话语中：“我们不仅寻求描述和分类现象，也理解它们为头脑中相互作用力的表征”(1916/17, 第67页)。精神分析理论的重要意义隐藏于这个事实--它视人的生命从他第一天开始就在主体的个人幸福和与别人互动中的冲突影响之下持续向前。可是，如果冲突和它们的角色在精神或身心疾病的起源上被定义为内源性的—不是人际间的，那么理论范围和相关治疗技术都受限制。

尽管，Hartmann (1950, 1955)的警告反对还原理论，精神分析技术的历史以片面性著称，并且不同的精神分析流派本身也清晰的证明这种片面性。哈特曼谈到“遗传谬论”，如果“实际功能与其历史相同，或不是减少遗传前提，犹如遗传连续性与功能改变一致” (1955, 第221页)。但是，还原理论的追随者不仅“喜欢断章取义、以偏概全”，还往往只看到事实的一部分并争论余下的部分，“这千真万确”(Freud 1916/17, 第346页)。

Freud正是在这一段讨论神经症的病因，并与精神冲突一起在其核心获得了“互补系列”这个假设。还原理论必定会受到批评，不仅是说到底它们的不完整和片面性，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它们把临时假设视为已然证明。相同的批评必定针对这种宣称—精神分析理论代表

全部真相并不得被保护以防止片面性。Freud的论文--不可分离的连接使其有必要对复杂性运用科学标准, 这种复杂性必然地用相对性的术语来描述真相的宣称, 并且使得一种主张尽可能比别的精确, 或者甚至驳倒它们其中的一个。总体大于部分之和的事实也同样适用于互补系列。他们伴随这种冲突起源的复杂性直接面对学生。举两个例子, 一是Balint批评片面的心理内源冲突模式并宣称解释是唯一的治疗手段, 另一个是科胡特Kohut的自体心理学源于他对新经典技术及其理论基础--内源俄狄浦斯冲突的不满意。

精神分析内部的学派模式一直是诸多不满意和其它因素的结果, 并且新学派抱着极大的希望依靠于此直到他们僵化进新的片面性。我们强调, 起着决定作用的分析师贡献的重要性对治疗进程, 目的在于过鼓励针对理论和实践的批评帮助消除学派的发展。我们的起点是如Brenner (1979b)描述的Freud的全面冲突理论, 而不是在特别病人小组的内源冲突因素。如此的限制导致相互运动, 最当前的例子就是Kohut的自体心理学。在精神分析理论中, 全面冲突理论模式的削减相当于实践中对二人关系的忽视。如果全面精神分析冲突理论在全范围内被重建, 那么, 如Wallerstein (1983), Modell (1984)和Treurniet (1983)指出的那样, 全面精神分析冲突理论可以合并描述自我缺陷或无困难的自我缺陷。自然地, 我们不能停止在一般的评论上, 如果我们确实这么做了, Goldberg主张的“如果一切都是冲突, 那么冲突什么都不是”(1981, 第632页)将被应用。但是, 不管它的发病机理范围如何, 精神分析冲突理论并未停留在老生常谈上。

史密斯(2005) 对精神分析冲突理论范围的描述体现在当前的观点:

“当聚焦在冲突概念的当代运用上, 我们可以开始剥开精神分析临床历史的不同层级, 就像剥开河边的层积物一样。可以肯定的是, 一些精神分析师不再用冲突来定义分析的特征, 也极少谈及冲突。另一些分析师则保持沉默, 但更多的是因为, 这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 他们认为其隐含在工作中了。甚至那些他们认为自己是冲突理论家的人, 也在不同的情形分析不同的冲突模式--不仅在病人心中, 也在时间素材里。

因此, 一些分析师聚焦于冲突作为结构理论的反馈; 另一些则关注冲突的地形学概念。一些专心于更加意识化的冲突表现; 另一些则深入潜意识冲突。一些人坚定地扎根于心灵内在; 另一些人却包括更多人际的或主体间的东西。”

多年以来, 冲突的病原性意义或病理冲突的解决一致与有关心理疾病--尤其是所谓的早发性障碍的缺陷理论相比较(Reiche 1991)。早期创伤对以后应对冲突的能力有负面影响(Häfner等, 2001a,b), 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没有发现缺陷理论和冲突理论之间有不相融合的差异。

### **构造理论: 冲突和认同**

精神分析结构理论高度关注俄狄浦斯冲突以及它们在神经症起源中扮演的角色。这种理论绝不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注意力只被限制在超我、自我理想、自我和本我之内或之间的内源或人际精神冲突。如我们将在第四章详细谈到——针对防御机制的各种各样阻抗关系的讨

论那样，结构模式被植入了客体关系之中。在他的结构理论和自我心理学著作中，Freud描述了客体关系内化的结果，如：俄狄浦斯阶段与父母认同的过程，作为其它认同的模式——包括在前俄狄浦斯阶段和成人阶段。在此有一个请求，那就是请认为Freud的根本观点是：认同代表情感纽带的最早模式(1921 c, p. 107)。

近几十年来，对自我和自我发展阶段的认同，尤其清晰的描述是，在结构理论框架之内，Jacobson（1964）针对前俄狄浦斯阶段和Erikson（1959）针对成人阶段的描述。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派的追随者在俄狄浦斯和前俄狄浦斯客体关系框架下描述了认同。但是，这些描述，并没有导致精神分析结构理论内部的潜在扩展。相反，精神分析技术变得更受内源冲突模式和标准技术的一人心理学所限制。究其原因，客体关系和尤其产生的认同都，像所有结构理论一样，聚焦于本能释放的经济原则基础上。这种Freud从Fechner那吸收的“恒定原则”是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也是改变一切的基础：

“神经系统就是一个仪器，这个仪器具有处理刺激或减少刺激至可能的最低水平的功能，或者，如果可行，将保持它自身处在一个完全不受刺激的状态”（Freud, 1915c）”

但是，在我们看来，默德尔（Modell）非常正确的在“自我和本我：五十年后”一书的序言中使用了下面的评论：

客体关系不是释放现象。Freud的本能概念就像某物从有机体内部升起，这不适用于观察——这种客体关系模式是一个包含在两个人之间的照料过程（一个不包含高潮或释放巅峰的过程）。再则，本能概念本身并没有收

到来自当代生物学的支持....如Bowlby所说的,我认为客体关系与其它物种的依恋行为有类似性(Modell 1984, 第199页至第200页)。

从结构理论角度之外来看待冲突问题, Brenner (1994, 2002)在其后期工作会对分析的团体进行询问,结果显示理论建构仍然运作于中心领域。谢弗 (Schafer, 2005 )也早已放弃了狭隘的二元冲突概念:

内在心理冲突作为一个组织概念可被看成是痛苦的中心或港湾,这吸引了很多患病倾向的注意,或促使了心理疾病发生。如冲突概念不再以如此方式被定义 显然有利于妥协。因为曾经组成妥协的东西 在一个背景下可被看成是一种胜利, 在另一个背景下可能被看成失败。

### **精神分析: 解释技术**

现在,全面精神分析冲突的心理病理可以在这个假设下进行,这个假设是: 没有客体关系的混乱独立于自我感觉的混乱。

借助这种方式--心理病理冲突在其中已经被系统化,以*问题解决系统方法*,换言之: 一种治疗理论,来补充解释精神分析理论是可取的。与那些在冲突产生中表现得像助产士的情形相比,治疗客体更愿意在舒适的情形中去控制冲突(我们选择这种比喻是为了强调发病机理的人际关系本质)。因此,令人惊讶的是,问题解决系统方法的发展在精神分析解释理论背后蹒跚而行,而分析师在其“改变认识”基础上(Kaminski 1970)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似乎合理的治疗模式姗姗来迟,这些模式如Sampson和Weiss (1986; Weiss 1993)强调的此时此地控制旧的创伤,这些创伤保留了他们的心理动力效力。正是这个例子,尽管Waelder(1936)已经在他的文章—多重功能的原则中为这个模式

创立了舒适的条件，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全面自我功能角色的问题解决：“自我总是面对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相应地，在自我中，这个过程可被指定为尝试解决问题，个体自我以一些具体解决方法为特点。同时，Waelder注意到与精神分析解释艺术有关的问题，他可能是第一个最早谈到精神分析诠释学的人。

## 对治疗的理解

目前为止，在我们所说的基础上，我们对治疗的理解可如此描述：移情的揭示和建构被解释推动，并在特别的治疗关系中发生。作为早期经历结果，病人的敏感性增强，在他的潜意识期望基础上，起初特别注意服务于建立重复的一切，并创造一个知觉的同一 (Freud 1900a)。病人在分析情景下拥有的新体验使他能够为先前不能解决的问题找到答案。分析师通过解释帮助病人获得自我觉知并克服潜意识阻抗；在这个过程，病人可能不由自主地获得令人惊讶的顿悟。因为精神分析性解释源于分析师的思想，所以它们也可以被描述为看事情的方式，如：见解。如果他们经得起病人尖刻的考验或符合其对内部现实所有的“期望”的话，因为顿悟，他们可能有持续的治疗效果。那么这些顿悟就会干涉正在经历的情形并在修通中改变它，这些将在病人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延续。病人可以主观地察觉到这些变化，它们也可以在行为改变和症状消失中得以证明。

这种治疗观念意味着精神分析方法的价值应该通过治疗引起的结果来评判。然而，尽管结构的改变可能是目标，但它可能被一种或另外一种不舒适的情境阻碍。在精神分析师没有任何情形可以回

避的情况下回答如下问题:

- A. 分析师如何看待假定结构（比如一个理论建议的）和病人症状之间的连接？
- B. 哪个内部改变（病人所经历的）和哪个外部改变显示了哪个结构改变？
- C. 按照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选择的治理模式可以被证明吗？

我们同意Brenner (1976, 第58页)所说: “尽管在它本身来说并不足够，对解释和基于此的推测的有效性来说，症状改善是一个必要的标准”。

精神分析技术的显著特征--解释，是关系这个复杂网络的一部分。其本身并无价值，也不是治疗的原则；分析师的精神现实，他的反移情，他的理论，成为分析情景的一部分。从一般知识走向个别案例的能力是精神分析的一种特征，如其他实用原则一样，反之亦然。

适当地满足每位病人独一无二的需求使得精神分析实践应用成为一种技能，一种技艺，一种为了能根据这些原则应用的必须学会的工艺，但是，这仅仅是作为一般推荐。尽管“技术”的当代内涵，我们不用担心使用“精神分析技术”一词，就像从精神分析训练角度训练哲学家所使用的一样（Wisdom，1956）。没有精神的技术和异化是一回事；精神分析技能处在技艺的另一个水平。在这种意义——他们取其精神部分并留下组织（康复）去照顾它自己——之下，精神分析师既不是“精神技师”也不是“分析师”。我们没有被对治疗的态度的误解所阻



止，这种态度可能为我们使用“技术”一词所引起，因为分析师在根据技术原理做出解释——在他们娴熟的搜寻中，在他们的启发式教育中，等等，直到病人的“啊哈”体验。作为一种解释学技术，精神分析方法与理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see Chap. 10)。

尤其是相关的精神分析解释艺术是一门目的论和表演性活动的学问。

*目的行为可以在成效方面上判断。这种行为原则技术地和策略性地体现有用的知识，这可能被关于真相的宣扬质疑，并且可以通过一个随着经验-理论知识增长的反馈关系来提高。这种知识储存在技术和策略模式中(Habermas 1985,卷1, 第333页)。*

采纳这些观点并形成一种模式，这对精神分析技术是有用的，它显然一定产生于目标导向行动的脑海中，自从Aristotle时代(Bubner 1976)以来，行动的哲学理论考虑是不受如Max Weber所设想的目的合理性所限制的。认为我们强调改变作为治疗目的，这个目的意味着我们有固定的目标，这将是对我们处境的根本误解。诚然，在精神分析解释中，交流不能是无目的的，但是目标不是固定的，而是由病人的自发性，由他的自由联想，由他对分析师思想的批判性检验和他们的公开的或潜在的目标所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新的方式和目标就像它们自己一样出现，但事实上是由带来精神分析过程多样性的条件所决定。

### 1.3 理论危机

相当长时间，精神分析处在“变革和几乎混乱”的状态(A. Freud 1972a, p. 152)。A.Freud写到：几乎所有决定理论和技术的概念都从某些方向遭到攻击。尤其是她提到的对自由联想、梦的解释（不得不放弃其对移情解释的主导地位）、移情的批评，这些不再作为在病人行为和思考中自发出现的现象来理解，而认为是分析师的解释所致(1972a, p. 152)。同时，精神分析内部的论战也变得更加激烈。甚至精神分析实践的基石—移情和阻抗—占领了它们旧的位置(s. also Holt 1992)。

关于精神分析的这些核心元素，Freud写道：

因此，可以说精神分析理论是一种解释两个惊人的和料想不到的事实观察的尝试，在尝试去追踪神经症症状并回到它们在病人过去生活里的源头，这种观察随时出现，过去的生活就是移情和阻抗的真相。任何识别出这两个真相并以它们作为工作起点的路线都有权称它本身为精神分析，即使它达到的结果不同于我们所拥有的(1914d, 第16页)。

显然地，如果这些基石中的其中一个被改变，或者如果为了迎合实践经验强加的要求，精神分析方法不得不依靠许多不同的基石，那么在理论和技术上就有重要的反响。

在其历史上的第二个世纪的初期，精神分析被多元主义和主观主义思想所主导。基本原理，如：移情、反移情和阻抗或多或少成为许多不同心理治疗方法的公认元素。这种概念上和临床上的多元化是否是精神分析中一定规模巨变的前兆还不得而知。机构忍受矛盾的能

力，不同理论的不一致和不相容 实践应用 治疗师 已经达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高度。精神生活复杂性的认知甚至似乎对同样现象提供了矛盾的理论。在这方面，某些东西已经超出了谢弗的多元论(1990)。尽管精神分析实践的多样性是令人向往的，但是一定不能导致一种“什么都可以”的任意哲学的开放(Feyerabend 1983)。多元取向就胜任治疗的必要标准拟定：“第一，无害”是最起码的一条(Tuckett 2005)。扩展已经使得区分不同的方向比精神分析在五十年代的传播更加困难。最新的是正式接受谈论精神分析，并因此为精神分析带来了共存和“共同点”的观点(Wallerstein 1988)。

在Freud去世六十年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内外的多样性已然被接受。不同观点不再被排除，这个曾经在过去导致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之外的独立协会的建立。创立者和他最亲密学生为“统一”所作的努力已经成为历史(Thomä 2005)。承认多样性迫使专业委员会去澄清彼此同意的领域和有区别的领域。尽管这种观点不是同一个，但是我们仍然面对理论如何影响治疗思想和行为这个老问题。

我们相信多元主义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被低估了，就其整体而言，可以说给精神分析带来了一个混沌的印象。比如：在如下论辩的帮助下，沃勒斯坦（Wallerstein）在临床观察中探索并发现了紧密的相似性：

一般解释理论和那些具体的某种学派都有有隐喻特征，这些隐喻只不过是令人质疑地符合被观察到的现象。沃勒斯坦（Wallerstein）认为，这些隐喻具备

有用的功能，因为它们在临床资料中是有意义，即使目前不能在比较研究中检查这些数据。参照G. Klein (1976)所说，有些东西正好相反，他强调靠近观察的临床理论的独立性，其假设可以像别的科学一样被测试和证实。

移情和阻抗、冲突和妥协被临床理论的主要元素认同。沃勒斯坦 (Wallerstein) 总结了他对干预效果的立场，除形式和理论引导词汇不同外，它反映了我们的分析方法和以阻抗、恐惧、冲突和妥协以及移情和反移情为基础的统一理论。他认为方法促进了观察数据的可比性，尽管有相当大的理论分歧。

现在，沃勒斯坦 (Wallerstein) 向前更进了一步，他坚决主张方法明显是不受理论约束。因为许多执业分析师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随着理论的改变去改变他们的技术是困难的。

如果从Kuhn (1962)开始的科学历史观点来看深远改变的标志，那么可以为精神分析进入其普通科学阶段比较晚提供好的理由以及好的论据来支持进化过程正在发生或范式改变即将发生这个观点 (Spruiell 1983; Rothstein 1983; Ferguson 1981; Thom□ 1983c, 2005)。广泛地分离观点通过它们与Freud工作的共同联系连接在一起。但是，清晰的是，分析师可以承认移情和阻抗这个事实并接纳其它精神分析的基本假设，比如：潜意识心理过程和性别评估以及俄狄浦斯情结评估 (Freud 1923 a, p. 247)，然而，用精神分析性研究和治疗方法却获得不同的结果。这再次证明了精神分析技术和精神分析理论关系的巨大复杂性。在“认同危机”思想 (Gitelson 1964; Joseph和Wildl□cher 1983) 上烙下烙印的革新扰动在正统精神分析中有其对应部分。作为对由内而外的彻底批评的反应，以及对精神

分析的本质表达关注，这样的正统说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解决冲突，它不有比一些可能的神经症反应更加适当。事实上，僵化和混乱彼此决定和影响，这就是为什么A.Freud(1972a)同时提及它们。

### 降低超心理学价值

精神分析实践不是以改变和创新为特征的唯一领域。在近几十年来，被Freud(1925d, 第32页)用来命名超心理学的“推测的上层结构”变得摇摇欲坠。许多作家视这种上层结构的放任为新时代的前兆，该上层结构是Freud在尝试定义精神分析为科学中建立。一些人认为精神分析性解释可以以这种方式从Freud声称的“科学自我误解”(Habermas 1971) 中得以释放，并回到其在解释学中的大本营。另一些人则持这样的观点——超心理学的放任至少可以引起精神分析临床理论角色的全面认知，这就较少推理并因此更好的作为指导服务于可被实证检验的实践。但是，形成精神分析理论大厦的各种故事却不能被清晰地分开。支撑超心理学的钢梁也贯穿低层，一些钢梁相比其它更容易在墙看见。超心理学假设也包含较少使用推理的临床理论，并影响分析师，甚至当他认为是在没有任何偏见的倾听的时候，如：他认为已经完全把自己交给均匀悬浮注意（evenly suspended attention）（治疗师倾听病人的自由联想并对其进行镜像反应）的时候。“甚至在描述阶段，也不能避免对手中材料运用某种抽象的构想，这种构想来自某处或其它，但确定的是不会来自于单独的新观察(Freud 1915 c, 第117页)”。

在对单个会面或治疗进行期间获得的材料进行二次理解中，分析师也将在与精神分析理论的看法的关系中关注他自己。Freud认为直到一个心理过程被动力学地、地形学地、经济学地描述为止，这种任务不会令人满意地实现：

我们看到，我们是如何逐渐地被引导在心理现象的描述中采用第三观察点。除动力学和地形学的观点之外，我们已经采纳了经济学的观点。努力探究兴奋总量的变化并至少达到某些它们纬度的相关评估。

就我们主题的整体方式而言，给予一个特别的名称将是合理的，因为这是精神分析研究的成果。我打算当我们已经成功在其动力学的、地形学的和经济学的方面描述了一个物理过程的时候，我们应该谈及其作为超心理学的陈述。我们必须马上说，就我们的知识现状而言，只有一些观点，我们将在此成功。(Freud 1915e, 第181页)

为了显示这种方法的临床重要性，Freud提供了一个描述“在这我们熟知的三种移情神经症中抑制的过程”。因为抑制是“精神分析的结构依仗的基石”(1914d, 第16页)，超心理学解释变至关重要，这对Freud而言更加清晰。在筹划超心理学时，他的目的是“为了澄清和实施更深的理论假设，在这个假设上，精神分析系统可能被建立”(Freud 1917d, 第222页)。根据Laplanche和Pontalis:

与其把所有涉及概念和假设本质的理论研究的这三个观点当作超心理学的工作，不如保留这种对更基础背景的描述，这可能更合适宜，因为他们发展或解释支撑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假设... (1973, 第250页)

这些作者认为Freud的著作中的如下部分为“严格地超心理学文

本”：“科学心理学计划”(1950a; 写于1895), *梦的解析*第七章(1900a), “关于心理功能的两个原理构想”(1911 b), *超越快乐原则*(1920g), *自我和本我*(1923b), *精神分析纲要*(1940a)。

因此, 直到他的最后时期, 在超心理学的观点中, Freud探索出了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 在“动力学的、地形学的、经济学的方面”(1915e, 第181页)。再则, 精神分析方法仍然处在深度心理学中。通过新方法的系统使用, Freud获得了发现, 这个发现使得调查对个体命运和发病机理的潜意识心理过程的影响成为可能。

分析方法和理论语言处于不同的水平, Freud继续在驱动经济方面寻求解释心理系统, 这可见于其死后发表的《*精神分析纲要*》。尽管他同时强调, 藏在“我们认知的两个终端”之间和脑与神经系统和我们意识行为之间背后的是什么, 对我们来说是未知数。关于这个关系的认识的增加将“最大的提供意识过程的确切位置以及没有帮助我们理解它们”(1940a, 第144页)。Freud有关于心理连接的不同构想。在本能概念和本能理论中寻求物理、生物、脑和神经生理对人类行为的解释, 他忠诚地停留于他最初的想法(Sulloway 1979); 但是, 深度心理学的解释模式朝向的是背景的意义, 对其的调查导致动机分析, 反之导致潜意识根据和原因。如果这些根据和原因被包含, 那么背景意义的理解被延伸到如此程度--有意义的解释可提供给先前出现却没有意识到的现象, 甚至提供给妄想体验和行为。

Jaspers (1963)使用“似乎理解”一词去描述解释和理解这个混合物, 这也为这些词的日常使用赋予了特色。这种“似乎了解”被

Rubinstein (1967)引入（作为高水平临床假设）了在美国的理论之争。因此，在精神分析方法中，这种双重解释以复杂的方式与理解联系起来。我们认为这“似乎”是区分的标志。

Freud对于心理连接的不同观点都起源于矛盾和强大的张力，这些都弥漫于他的工作并造成了当今的理论危机。借由精神分析方法的帮助，他得出了一些理论概念，他试图用这些概念去描绘超心理学术语并追溯生理过程，同时发展精神分析理论，保持原有的方法。即依靠在分析情景中积累的经验以及不从世纪末生理学和医学中借用思想。与此同时，Freud用能量投注来解释超心理学中的抑制，他在潜意识一文中写到：

心理的潜伏状态的存在是公认的，被认定是一种意识心理状态或者躯体状态。是否这种心理的潜伏状态威胁到自身的解决并会转为一场口水战，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明确的。因此我们建议，最好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我们所了解的这些争论状态的性质。直到生理特征得到了关注，不然我们是接触不到的：没有生理的概念或者化学过程来让我们了解我们自身。另一方面，我们直到生理学中也有很多概念提及到意识心理过程；只要做足了工作，我们就能将意识心理过程转化或者替代，所有我们用来形容意识心理活动的词都可以参与进来，例如思想，目的，分析等等。事实上，我们有义务告诉大家，许多只在意识状态中存在的潜伏状态确实也存在于意识缺失中。因为我们应毫不犹豫的将他们看做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并将他们与意识精神活动紧密联系起来。

顽固否认潜伏心理活动的心理特征，可以归结为这样的情况：大部分的现象都没有被纳入到心理-分析的研究课题中来。任何忽视病理学因素的人，认为动



作倒错是个人意外发生的人，以及用古来的眼光看待梦，认为梦只是泡沫的人，他们会忽略更多意识心理学的问题 顺便提一句，在心理-分析以前，催眠实验特别是前催眠暗示已经被证实是确实存在的，是心理潜意识的操作模式。（1915e, 第168页至第169页）

根据Freud的*入门讲座*，（1916/17, 第21页），"精神分析要将自己从假设中解脱出来，无论是关于解剖学，化学还是生理学的假设，并且精神分析要完全按照纯粹的心理学观点来运作。" 在Freud著名的发言中，他写到："尝试给精神病学提供它缺乏的心理学基础" 并且"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去探索生理与心理交汇的共同点。" 然而事实上占主流却又隐蔽的观点，与Freud "科学心理学项目" (1950a)同等重要，自1895年起Freud就尝试发展科学心理学，即将心理过程作为量化来研究。Freud对精神分析的超心理学结构也抱有期望，即它的上层建筑，终有一天"可以凌驾于组织的基础" (1916/17, 第389页)。

精神分析的相关概念特别关注潜意识心理过程。将Freud建立的心理学与心理病理学的冲突放在一块儿，可以理解他们是基于生理与心理疾病的巧合。在近几十年精神分析从发展和认知心理学中采取了一些观点。而且，科学理论之争的结果认为，精神分析方法和可查的心理现象相关，这已经成为大家关注的中心和测试理论的焦点。这些发展让精神分析整个理论结构产生了一个的原则上的危机 我们的任务就是更新精神分析理论，它是源于超心理学并且在本质上和方法学上的根基都很浅薄。

## Waelders的影响

Waelder 在他的“精神分析，科学方法与哲学”这篇文章中回应了哲学家的评论，其中概述了不同程度的精神分析理论，及其相关概念。

A. 个人临床解释（个人“过往的”的解释，Freud 1916至1917年，第270页）。这是在观察水平上，即分析师所收集的病人信息，而这是通常是别人无法获得的。分析师则寻求去解释个人信息的内在联系，以及其与行为模式或意识与潜意识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

B. 临床概括（Freud的典型症状）。分析师在对病人个人信息及信息解释的基础上，做出概括，对病人群体，症状发展和年龄层做出具体的描述。

C. 临床理论。临床解释和概括形成了许多理论概念，有些概念可能已经包含在或源于临床解释，例如，压抑，防御，压抑内容的重现，和退行。

D. 此外，精神分析临床理论，并没有与精神分析超心理学明确的分开：如投注cathexis，心理能量psychic energy，性欲Eros，死本能Thanatos等的抽象概念。Freud的个人哲学，特别是在超心理学和它之后的思想中可见一斑。（见Wisdom 1970年）。

这个结构表明了精神分析理论的层次，经验内容的不停变化，这有必要纳入科学评估的考虑当中。

Waelder 认为，抽象概念的水平越高，相关的精神分析实践水平越低。如果这是真的，如果临床理论能够脱离超心理学假设而看做

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就能清晰的界定什么是理论危机了。事实上，为了将意义置入背景中，无论是对意义的理解还是说明，都很难区分哪些观点是纯理论的上层建筑，哪些是绝对必要的。精神分析的方法，特别是指对潜意识心理过程的认识。观察无意识和前意识如何进行愿望和意图表达，通过动作倒错（parapraxes）和症状 - 压抑的再现 - 既属于结构的最低水平，也是较高的一个水平。然而分析师不是从高水平来看，而更倾向于使用超心理学观点，即Waelder设定和使用的底层。从地形和结构的角度看，即，将心理组织划分为无意识，前意识和意识或本我，自我，超我，说明连接楼层上下通行的阶梯的存在。

Waelder的描述被Farrell（1981）修订过，我们认为这是适当的，Farrell将理论的低水平与高水平之间的关系比作“他们在功能上具有双面性”。在下面的故事里他描述了这个概念必然的双重功能：在分析师日常工作中，不使用概念去阐明心理机制的细节，而是整理病人所提供的材料。这里的概念的功能在较低的水平。但如果他用理论的角度去考虑的话，会用退行和压抑的概念去澄清病人的心理机制是如何工作的。Farrell写到，对于联系的简单介绍也是处于较低水平：例如，一个遭受挫折的人往往会退行到一个发展的早期阶段。作为压抑的例子，Farrell提到关于成年患者性焦虑的定期观察，他们忘记了（压抑）的童年经历，而这些经验在治疗中重现。分析师使用这种概括以帮助病人或与病人进行沟通（基础的）。这种模式试图解释“意识淡薄”的内容：

但，如果分析师去考虑这些内容为何以及如何产生的话，就会使用退行和压抑来帮他区分和描述整个系统中事情所处的状态，这样就实现了理论的高级阶段。

因此，概念在低层次上具有双面性，而且和潜意识理论相关。然而，当要给事件的*观察序列*做一个描述的话，如果分析师纯粹只考虑将信息登记下来，就会忽略*联系的观点*。虽然学术研究是遵循不同元素之间都存在着联系的观点，在信息的收集过程中首要的是将与个体相关的信息完整的记录下来。因此，心里分析下的观察必须以描述性记录为前提。

### 理论危机的出路

许多分析师将超心理学与作为说明性理论，认为其与精神分析的  
科学地位相连，并声称治疗具有因果关系，这危机影响了作为一个科学家和治疗师的分析者。一条使其摆脱这个困境的方法是完全放弃说明性理论，而使用在实践中起着主导作用的精神分析解释。在德语国家，用说明性科学数据来对人文和社会科学进行理解（*verstehende*）可追溯到Dilthey和 Rickert,以及 Hartmann（1927）相信他已经清楚的表明精神分析是一门科学。然而，随后对此的辩论又在英语国家重新掀起。Klauber (1968)认为 Collingwood (1946) 是英国历史上最早提出理解方式的人之一。 Home (1966) 和 Rycroft (1966) 也有相同的主张。北美分析师们很快采取了法国哲学家Ricoeur的思想，他将Freud描述成一个解释学家。“科学主义的自我误解”是由Habermas (1971) 创造的，用来形容Freud变成受害者是多么荒谬的事情，后来

成为一个很流行的词。Habermas也提到了超心理学中的说明，然而精神分析同样需要说明性理论作为概括，以深入的治疗病人，即，提供解释。

## 诠释学

此刻，我们想重申下我们之前出版物中对“诠释学”(hermeneutics)提及的一些言论 ( Thomä and Kächele 1975, pp. 51-52 )。

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 “*hermeneuo*” ( 用文字、解释，说明，转换来表达我的思想 )。诠释学 ( hermeneutics ) 和赫耳墨斯 ( Hermes ) 经常被认为有词源上的联系，赫耳墨斯是上帝的报信者 ( 也就是诠释者 )。然而，两个词的相似确实一件巧合；*hermeneuo*追溯词源是与“说话” ( speak ) 意思相近。诠释学 “hermeneutics” 源于十七世纪，用来描述解释文本的过程。诠释学的发展受到圣经注释的强烈影响。神学家与诠释学倡导者之间存在分歧，例如，施莱尔马赫原则所述 ( Schleiermacher's principle ) (1959 [1819], pp. 86-87):误解总是先于理解。从而，理解就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我们必须对一个对象略懂一二，也就是在我们研究它之前有一个预理解 ( preunderstanding )。

语言学中有一个分支是文本解释，它的根本问题是意义 ( sense )，即，有关文字的含义。

人文科学与此语言学分支已经将诠释的途径进行了清晰的描述。语言学，神学和历史诠释学都与心理的理解形式直接相关。将个人感受和思想投入到原文中，或置身于他人的处境里，这个要求将心理的理解形式与人文科学联系了起来。重建他人经验的能力是先决条件之

一，这是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必须满足的一项。在自由联想与平等悬浮注意（evenly suspended attention）这两项互补技术中内省与共情是其基本特征。这句话“所有的理解都基于对自我和客体的认同，自我和客体的调和被划分到理解之外；而对我来说，不理解的事物仍然陌生和不同”本可以出自一个对移情感兴趣的精神分析之手(e. g. , Greenson 1960; Kohut 1959), 但事实上它源于黑格尔（Hegel）(Apel 1955, p. 170)。科胡特（Kohut）强调，Freud将内省与共情作为系统观察和探索的科学工具。Gadamer写到，解释始于

不能被立刻理解的文本。对现象直接表象不理解的地方，都需要个体来进行解释。因此，心理学家不会接受病人生活现状的表象，而是去探索病人无意识。同样，历史学家对记录的事件进行解释，用来挖掘事件表层和隐含的真正意义。（1965, p.319）

Gadamer 似乎是有着执业精神分析心理学家的头脑；他的描述具有心理动力学方法的特色。对于难以理解，表面上毫无意义的心理病理学现象因素，正是精神分析方法追溯其根源，让其易于理解。这远不止是偶然的细节问题，根据Gardamer，歪曲或模糊的文本造就了最难的诠释问题。语言诠释学有这样的障碍，类似在心理学理解中也存在无法跨越的障碍，就是，缺乏解释性理论。

### **超心理学与理论危机**

回到我们讨论的主线上，一个关于理论危机及其蔓延的评论贯穿

在精神分析的各个层面，而超心理学在此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具有挑衅性的文章标题传达出爆炸性讨论的效果，Gill认为“超心理学不是心理学”（1976）。G.Klein(1970) 问到：“两个理论还是一个理论？”来评判性欲理论。Meissner(1981): "超心理学—谁需要呢？"。Frank (1979) 探讨了 G.Klein (1976), Gill 和 Holzman (1976), 以及 Schafer (1976)的书，我们从这个标题就看出他似乎放弃了“两个理论还是一个理论，或者没有理论？”Modell (1981) 用“是”或“否”回答了“超心理学是否依然存在？”这个问题：超心理学的特征观点都是误导而应被摒弃的。所有Modell遗留的传统超心理学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最后, Brenner (1980) 认为他对Freud相关原文的注解可以用来澄清他同僚们的失常及困惑。他指出，超心理学等同于Freud的潜意识过程理论以及整个深度心理学 (p. 196)。

Freud有关超心理学的原文能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而这些不同的解读正是当今争论的根源(Schmid-Hellerau 1995; Thomä 2003)。所有严肃的精神分析讨论都始于对Freud原文的注解，但问题不止于此。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白，为什么理论危机会影响到精神分析的方法，因为这影响分析师用什么样的观点分析材料以及这些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帮助理解过程，甚至进行解释。从探索的角度上看，Freud的观点的形成基于癔症和其他心理病理症状的观察，这些症状可以让他做出关于潜意识过程的出乎意料，独一无二的解释。随后，他发展了一个新的方法用来进一步验证随后观察产生的新观点。没有人不需要理论。在一篇重要文章中，Wisdom (1956, p. 13)写到，“今后，当面

临问题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理论。”在文章的同一页，Wisdom明确指出不同的精神分析技术都试图去解决实际和理论问题。

### 超心理学的假设

分析师如何回应由超心理学理解而来的爆炸性问题，他们如何诠释Freud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著。我们的研究使我们相信，Rapaport 和 Gill's (1959)对超心理学的解释与Freud著作中的立场是一致的，给予不同的超心理学观点以相同的权重。虽然之后，Gill (1976)将Freud的经济学（生理的）方法的中心地位归功于解释。关于这一点，有诸多原因导致意见分歧。一方面，相关段落可以由不同的解释途径；另一方面，分析师的实际应用，所有超心理学观点当然与病人的经验也有联系。在这方面，超心理学依然是心理学。最终，相比对个人潜意识定量处理的经济学观点，动力的观点以及地形的观点更接近经验和人类冲突。然而在我们看来，超心理学的描述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Freud除了坚守经济的观点，还试图基于人类本能理论和生物学理论，同时也希望定量因素稍后可以为仍未解决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这就是“动力心理学中量化观点的错误使用” (Kubie 1947)的由来。

正如Meissner (1981)所提议的那样，如果超心理学的具体内容是空洞的，改变是当然没必要的。他让自己与超心理学观点保持距离，只将其看做一个指导观念，一个每个科学家除了研究方法部分都需要的观念，——一个不容争辩的陈词滥调。Modell (1981) 同样提取了超心理学的物理主义特征，见Freud将“女巫超心理学”作为卓有成效的推测和幻想的标志。象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分，女巫的厨房）



中的摩菲斯特(魔鬼)问“这就是对付女巫的方法?” Freud是从哪里想到去寻求“女巫入门书”的协助? 在《有限期间与无限期间的精神分析》(1937c)一书中,他试图进一步去解答这样一个问题“依靠分析治疗处理本我和自我间的冲突, 处理根据本我产生的致病性本能需求, 这种处理是否是永久和明确的”(p.224)。他像巫婆寻求帮助:“我们只能说“我必须要召唤巫婆”——女巫超心理学。没有超心理学的推测和理论, 我们不可能再向前发展 (1937c, p.225)。在参考了巫婆之后, Freud相信他找到了本能力量的定量元素, 或找到了“本能能量与自我能量之间的关系”(1937c, pp. 225-226)。Freud用经济原理来解释了快乐与不快的经历。他假定心理和躯体的快乐与不快的经验源于心理能量情感思想的投注: 能量能够发泄即产生快乐。投注与释放是Freud假定存在的调节机制。女巫超心理学不但没有把我们领入想象的世界反而到了一个实际的量化问题, 而Freud指出的一些领域也是用精神分析方法无法达成的: 生物基础, 脑神经生理过程——总之, 存在于体内的过程。

Brenner (1980) 称已经他得到了正解, 超心理学与心理学中的潜意识和整个精神分析心理学等同。不可争议的是Freud强调量化, 经济学原理贯穿他的整个工作而不光是在他的著作中。这点功于Brücke 也就是Helmholtz 学派——好像找到经济原则的源头能改变精神分析理论的决定因素, 显然还有潜意识理论和释放与精神发泄, 也就是经济观点的或能量观点。连Brenner也承认Freud的主张是动力地, 构造化和经济地解释心理现象。Rapaport 和 Gill (1959, p. 153)

认为这些假设正式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这是指在Freud的著作中，“心理结构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动态关系已经被我们确认—或者说是被推断、推测”。如果我们再将遗传和适应的观点考虑进来，这五个超心理学观点集合在一起就涵盖了整个精神分析理论的范畴。

### 理论与方法的关系

现在的问题不是看有多少既定的假设，抽象概念在何等水平，而是去看哪些理论假设能够被精神分析方法或心理学实验所证实。在Brenner对理论和方法关系的探讨中，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Freud从生物学角度借鉴的元素限制了对深度心理学和精神分析解释的理解，这些元素甚至歪曲了解释部分，正如Modell (1981)所表明的那样。此问题已经导致了对超心理学经济角度和与此有关的所有理论假设的批评。用精神分析方法收集到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被分析师的观念所影响。因此，所谓的心理动力中的重要力量是很重要的 (Rosenblatt and Thickstun 1977)。相比之下，Brenner (1980, p.211) 相信无论用心理能量或者动机驱力，亦或者用abc这类的符号来代替都没什么差别。然而，自从精神分析方法囊括了潜意识，用匿名的符号还是用重要且目的性强的术语变为至关重要的话题。

Modell (1981, p.392) 强调超心理学不是对临床理论进行解释，而是它的起源。为了支持他的论点，他引用了Freud的一本书《自我与防御机制 (1973)》，如果Freud没有引用超心理学的观点，没有提出潜意识能量可视为自我的一部分的新模式，就不会有这本书。抛开他做的所有修改，Freud始终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观点；与此同时，他

非常清楚在探索人类的心理生活的过程中方法所扮演的作用。换句话说，他用二元论的途径进行潜意识过程、压抑的起源和结果的心理探索。他的天分克服了超心理学的伪解释并且为其之后的伟大发现铺平了道路，见他的《自我与本我》(1923b) 和《集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1921 c)。

同时，他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中提及心理生活的巅峰，并试图将在此提供超心理学基础。尽管他宣称精神分析的科学之处是从心理学中借鉴的观点(1927a, p.257)，但他的伪科学的（超心理学的）解释仍持有较高声誉，他要求（在1932年给 V. von Weizsäcker的信中）分析师学习“去限制自己的思考的心理模式”（出自 Weizsäcker 1977 [1954], p. 125”。这就是为什么Gill的“超分析心理学不是心理学”这个标题如此震撼。

### 经济学角度的批评

当今的危机源于精神分析学者的评论，他们不允许自己采取简单的方法。Grill就是其中之一。在他与Rapaport(Rapaport and Gill 1959)合作扩充了超心理学之后，他又与Pribram(Pribram and Gill 1976)一起对被称之为Freud思想的转折点的*科学心理学项目*重新进行评估。从Weiner(1979)对Pribram与Gill文章的回顾以及Holt(1984)为纪念Gill的生活与工作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摒弃经济角度的观点是超心理学不可避免的基本原则。深度心理学的方法不能从神经心理学或生理过程角度上做出陈述。然而，Freud反复回到经济的角度并对生物能量分布做出假设，我们这就介绍其中原委。

精神分析师的处理过程经常与个体亲身经历有关。病人躯体状况的主观理论是拟人化了的，即，他们反映了躯体的婴儿观念。不光是超心理学的语言中保留着陈旧的生理学观点，它的隐喻也提升病人对自身躯体的幻想，即，他们关于自己在抽象水平上的意识和潜意识的形象。Gill (1977) 指出超心理学充满了背叛始于婴儿性观念的图像。依靠超心理学系统, Freud想解释投射曾引领了形而上学观点的发展。

婴儿概念和过时的生物学观点共同交织了超心理学的隐喻，当我们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在理论中站不住脚的概念还是这么生龙活虎。就像Grill一直坚持Freud的定义和特殊内容以及超心理学，这些都不能再被科学理论所接受了。然而，如果将概念抛给另外的分析师，每个人都可以重塑这些概念，但仍不会有什么改变。如此，Modell(1981)将所有全部的心理现象概括到超心理学—例如，重复，认同和内化，都起源和发展与俄狄浦斯情节，超我和自我的观点。他相信所有人的处理都是一样的，既，依靠生物学的定义，进行最高程度的概括。

认同，自我冲突，乱伦欲望，和与乱伦禁忌这些普遍现象尽管在不同文化下内容不尽相同,但存在于所有的文化当中，我们认为仅靠这一点，就从生物学角度来定义它们不合适的。这些心理社会过程的先决条件是符号化的能力，而这通常不归因于生物学。然而俄狄浦斯三角中的乱伦禁忌可能早已出现，我们认为Parsons(1964, pp. 57ff.)使用心理社会和社会文化的途径来提出生物学假说，即早期智

人就有外婚制和回避乱伦具有遗传优势。

必须强调的是心理社会和社会文化现象有一定的自主权；它们的起源和修正都不能归结为生物学进程。就此而论，与Rubinstein (1980)相反，我们认为Popper and Eccles' (1977) 的推理论点赞成作为精神分析身心问题交互观点。Popper 和 Eccles 认为当一个人学习语言及发展对语言的兴趣之后，掀起了大脑和智力的发展，这些都归因于进化对心理过程的重大影响。

我们所关注的并不是个体进化对心灵内部世界的影响，或者是Popper 和 Eccles' 于此的猜测，而是另外一种哲学交互的含义：精神分析作为心理社会科学，从超心理学基本原则——唯物一元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Popper 和Eccles 用哲学与神经生理学之间的启发性争论，而且比Rubinstein (1980) 所假定的推测要少。Kandel's (1979, 1983)神经生理学——更好的称呼是心理神经生理学——对一种蜗牛（海兔）进行试验，提示有交互作用，同时证实了心理具有自己独立的作用的这个观点。对这些蜗牛进行器官的系统感觉刺激，导致相应脑区脑细胞结构的改变 (Kandel 1998, 1999)。总之，这些开创性的实验可以用来解释认知（心理）过程带来结构性的（细胞的）变化。

### 对超心理学评判的综述

我们可以总结说，Gill, Holt, G. Klein,和Schafer对超心理学的评判是让人信服的。Modell 认为只要对Freud过时的生物学原理解释进行批判就可以简单的化解这个问题。他引用了能量观点的形象化

例子，说它导致了放电映像的错误理论。我们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在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混乱，起源于Freud的唯物主义一元论，最终打达到心理和身体产生的同构。因此，我们主张精神分析理论，它主要借鉴了心理学和心理动力学的思想理论基础(Thomä 2002)。这个途径是有方法学原理的，因为它是唯一一个为心理生理相关性的研究提供实践基础的方法。然而，必须指出这样的调查研究的灵感多是源于"使用神经生理学实验，检验心理理论"这样的乌托邦观念。但神经生理学方法和心理学理论设计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对象，这个事实是不能忽视的。因此去讨论心理学与神经生理学是否兼容是毫无疑义的。

就如，我们感兴趣的是寻求外界的一致性(Strenger 1991)，但我们也要量力而为。

在精神分析与神经科学的对话中，主要是提出能让神经科学家关注的问题(Leuzinger-Bohleber et al. et al. 2008)。这也就是为什么精神分析师对分子生物学没什么太大兴趣的原因。而神经科学对情绪理论的限制恰好和精神分析有很大相关。Panksepp (1999) 对此提倡进行观点交换：

精神分析理论在情感动力多样性上可以对神经科学进行指导。作为回报，神经科学可以让精神分析理论与客观途径紧密的联系起来 (p.15)。

关于这一点，Gabbard (2001) 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批判性问题“神经科学能教我们什么是移情么？”神经生物学与精神分析都保持系统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正如心理治疗对潜意识过程有着百年

的关注一样，他们之间是可以互惠互利的。这种跨学科合作看上去激恼了德国著名的神经科学家Gabbard (2001)，他坚信他必须要防止脑研究者与“精神分析”掺和在一起。同时，他为脑炎就做出三页纸的抱腰，用来表明他们足以竟能解世界上一切的东西。神经科学要接手精神分析行业几乎不可能成功的事情，由此成立了国际神经精神分析协会并举办杂志“神经精神分析”。

### 动机澄清

显然，有一段时间精神分析的理论危机发生了转变，首先是分析师们不再困惑于伪科学的超心理学对能量转移等等的解释。逐渐地，基于精神分析方法的知识，适用范围以及实证意义的分析情形，都成为科学研究的主题，这些早由匈牙利分析师Hermann 在很久以前强调过，却被我们遗忘了。(Hermann 1934)。

这项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关系到与方法应用中最重要的部分：治疗。这场危机已经采取这一转变，这一点最近才开始变得清晰。首先，放弃超心理学就一定包括放弃所有解释性理论。许多分析师将因果性解释等同于科学，认为精神分析中此类解释源于超心理学。然而，超心理学缺乏实证科学理论的所有特征。Habermas' (1971) 批评Freud的“科学主义的自我误解，”这句话指的是超心理学的伪科学解释，它成为了一句流行语但另人忽略了一个事实，Habermas既高度重视解释也高度重视潜意识过程的解释性理论。在之前发表的关于临床心理分析研究的方法困难(Thomä and Kächele 1975)中，我们细致的讨论了这个问题，在文章中我们试图强调治疗工作中解释的突出

作用，精神分析方法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解释学，以及Freud称对人的经历，行动，行为和心理分析有系统化的解释。然而，自从精神分析理论解释了等同于超心理学，以及Rapaport's 的大量系统化尝试让我们懂得这些观点无论是在分析情景中还是在实验当中都是无法被印证的，分析师的诠释学转向既有向Rapaport循环内也有向循环外的，这似乎提供了一条出路。

我们现在对G. Klein著作中所提到的诠释学转向做一个澄清， G. Klein是将诠释学与临床理论连接在一起的研究者。相较于 Waelder's (1962)多层建筑，Klein区分了两个理论体系，与根据问题分类有所不同。他手下阐述了与性相关的差别 (1969),然后再进行概括 (1970, 1973)。 Klein 用为何—及—如何的方式，参照Freud的梦的解析，将临床心理学与超心理学分开并进行鉴别。临床理论集中于意义，目的和意图的问题上。精神分析科学基础的理念和超分析心理学的伪解释联系到了一起，由此Klein 采用了一个二分法去理解分析实践，这样问题的解释就可避免及忽略了。这里的问题是是否动机解释具有认识论的形态，是否和因果解释的原则有所不同。

哲学争论在于动机和理由是否是一个等级的概念，因果解释是否不同于人类思想和行为的证明，两者是否均衡。精神分析解释的逻辑及他们在动机和功能二者描述方面的立场，都构成了自身的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Rubinstein 1967; Sherwood 1969; Eagle 1973; Moore 1980)。关于动机和理由的讨论至今还没有定论 (Beckerman 1977; Wollheim and Hopkins 1982; Grünbaum 1984, 1993; Davidson 2001;



Stephan 1999)。关于治疗实践，同时参考动机解释和语义含义。我们摘取早期发表文章的一段来阐述这一点：

关于症状，由解释性假说构建起来……因此它们成为了理论陈述，从中可以推测其独特的预后。一般来讲，这些预后是基于神经症状态是特定条件基础上的，治疗的过程定要分解这些神经症状态，促使产生改变。(Thomä and Kächele 1975, p.86)

本论题无非就是Freud关于抑制的理论，这一点Habermas也认同。然而相比于Habermas和Lorenzer(1974)，我们坚信，改变能够发生且必须超于主观直觉之上。像Freud，我们假定特殊的决定因素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存在的，即本能冲动的抑制与其以症状的形式反馈之间的联系是存在的。Freud使用了一些超心理学术语来撰写他的文章：

我们已然从另一条途径接触到潜意识这个术语或者概念，这条途径就是对经验的加工，而其中心理动力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发现，我们必须假定—存在非常强大的心理过程或思想（这里首先考虑的是量化，也就是经济因素）这些心理过程或思想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生活，虽然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但这些影响结果又可以作为思想被再认识。这些早被验证的话题就不再在这里进行详细的重复了。这足以说明在精神分析的理论 and 声明中，关于为什么这些思想没有能成为意识，是因为有特定的力量阻止他们，不然他们就能成为有意识的，我们将会看到他们与其他公认的心理因素有何不同。移除反对力量并且将问题意识化，通过这

两种方式所发明的精神分析技术，显然是无可辩驳的。在思想变为意识之前的状态我们称之为抑制，在分析工作当中，我们认为产生和维持抑制的力量是一种阻抗。（1923b, p.14）

我们认为，在超心理学术中所描述的语阻抗力量，不用涉及“经济因素”就能对精神分析进行解释和进行精神分析研究。作为解释性工作的结果，维持抑制（即症状）的条件产生了变化。最终，抑制的特定潜意识原因会失去效力。这个改变可以解决如何确定因果关系过程，而不是关系本身。正如 Grünbaum (1984)所强调的,这个结果实际上证实了关系的猜想作用。值得注意的是，Grünbaum本人已确认这方面的说法。他—与他的基本立场相反—证实了在临床检查中证实精神分析假说的可能性。（Thomä & Kächele 2009, p. 34）。

这里我们的关注点在于，阐述精神分析关于潜意识心理过程的解释性理论，这就是解释（*interpretation*）。任何在精神分析情景中的系统研究必定包含认识和解释两个部分。精神分析师当做出共情解释的时候，头脑中浮现什么想法是尤为重要的。我们的观点是，特别要关注精神分析师的所掌握的初步理论概念是如何对他的行为产生影响。不幸的是，在本文中，超心理学的经济学观点始终存在于深度诠释学当中—在Habermas (1971), Ricoeur (1969), 特别是 Lorenzer (1974)的书中，—就像我们现在的知识掌握，很清楚的表明这是很不适合的，因此也不适合做一个解释的框架(见 Thomä et al. 1976)。

## 作为隐喻的超心理学

现在有一个事实是不可忽略的，许多分析师在向超心理学告别上十分困难。超心理学的隐喻在过去的几十年，以其心理动力含义将原始的物理意义取代。例如，Fechner的恒定原则，里面包含了经济学观点，转变成了涅□原则。甚至在表达人类真理，具有深刻含义的Nietzsche's (1973 [1893]) 诗中：“所有快乐都追寻永恒……深，深的永恒”。这可以理解为恒定原则和释放理论的拟人化表达。

这些G.Klein称之为“生命的快乐”的表达，是有一定的生理基础的。饥饿和性欲具有被称之为“本能”的良好特质，并且作为一种现象也与其他经验不同。性高潮是躯体感受的极致，同时伴随着疯狂的喜悦感受。触摸的狂喜近于永恒，而又一次从巅峰落下，这仅是为了再次寻找那种感觉，再次拥有这种渴望。而此时积极和消极反馈的平凡过程的发生（即，意识和潜意识水平的动机过程）并不在Freud本能理论当中，虽然他的理论中建立了一个反射弧的模型。因此Holt (1976),基于对临床数据的详细积极的评估，得出了一个力比多理论，即，人类性心理的发展，他得出结论：本能趋于灭亡，而超心理学概念必定被愿望 (*wish*) 这个词所替代。他仔细的研究并提出另人信服的临床和经验，都支持了他的观点。我们现在就不谈的过于细节，但是我们希望指出Holt使用Freud的希望理论来充分的涵盖所有性心理学的元素。目前，关于精神分析的动机和意义理论正在建构当中，如果它能够很好的将被观察到的已知现象进行解释并更让人信服，在目前混杂的理论当中去解释有关的潜意识问题，就理论危机而言就是

一个比较积极的发展。

而事实上，在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当中，例如具有如此挑战性标题：“精神分析理论还剩下什么？” (Wisdom 1984) 和“死亡与超心理学的变形” (Holt 1981)，许多关于潜意识动力性含义的精神分析理论，在混杂的超心理学中更为抢眼。

最后人们又转回到Freud早期关于潜意识心理生活的结论：首先是愿望。本能的愿望是我们生活的动力。特别是当人类的这个原则中充满的快乐和痛快的经验的时候，

避苦趋乐就是人类活动中最有力的动机。快乐痛苦原则是第一阶的调节框架。如果动机理论中没有动力潜意识，精神分析将变得肤浅。然而，这里，我们遭遇到了方法上的困难，正如Wisdom指出：

谈到潜意识[即，动力潜意识即使是通过解释的方法也不能变成意识]更像是树的根，无论基于它的生长冒出多少枝芽，即使树根破土而出也不可能等同于枝芽。与表象相比，潜意识总是具有诸多潜能。潜意识的科学地位就像物理学中的高水平概念，永远不能通过直接观察找到谜底。(1984, p.315)

Freud早在*梦的解析*中，发现思维转移到前意识，从而推断潜意识愿望的存在。关于这一点，它一直是基于精神分析希望理论的推断；这是始于Freud还是现代假说，神经生理学的过程假设对这一点既不能认定也无法否定。

Freud早在*梦的解析*中，发现思维转移到前意识，从而推断潜意识愿望的存在。关于这一点，它一直是基于精神分析希望理论的推断；这是始于Freud还是现代假说，神经生理学的过程假设对这一点既不能认定也无法否定。不能仅因为饥，渴，性比起释放而言更是一种调节机制，就宣判本能（Freud超心理学意识）死刑。Holt (1976, 1982) 关于精神分析的论证是十分明确的，但仅能假定Freud超心理学假设可以作为科学解释的基础。正是这个观点，让分析师们没有意识到已经弥散到全部理论和实践中的二元本能理论的不足。

精神分析的解释理论一直紧系着19世纪的生物学，而不是分析情景中所积累的经验。当然，在精神分析情景和精神分析实践的隐喻语言中，即使超心理学被埋葬，并处理身后事，它还是被长期理想化。处于方法学的原因，相对于Rubinstein (1976) 和 Holt (1976)，我们接受了Popper 和 Eccles' (1977) 心理物理互动的观点。但随后重点转移到：个体的早期经验对神经网络有着越来越特殊的影响(Spitzer 2004, S. 89)。这可以从心理学层面中情感模式的稳定性中看出来(z. B. Sterns RIGs)。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来讲，行为模式的发展最初源于交互影响，然后聚焦到脑活动上来。例如，惊恐与杏仁核的激活有关，现在直接归因于杏仁核。与恐惧有关的整个功能循环，它们的情景条件也被归于自创过程，即，自我再生与自我强化，这都归结到杏仁核的活动上来。恐惧是否定位在杏仁核上，Thomä (2002)给出了一个另人欣慰的答案：

恐惧并不能定位在杏仁核上。迄今为止，在杏仁核上发现的与恐

惧症状群有关的神经生理改变，并不是起因，相反是对危险下意识觉知持续不断的神经生理调整的结果。（P.18）。

虽然它们强调情绪/心理水平以及生理水平的独立性，认同理论最终都定位于一元唯物主义，Freud也是其中之一。对认同理论的学习一般都基于潜意识。我们对自身躯体已经认同，但同时也很陌生，毕竟我们看不穿自己的身体--身体的内部。我们对成像过程的痴迷让我们现在能观察道大脑内部。五十年前的哲学家Feigl (1957)发明了一种虚拟的脑病检眼镜，它可以将人的体验转化成许多的数值。这也意味着会出现另外一种语言系统，另一种世界语。然而Feigl的梦想，成像过程在此时是难以实现的。身体内部，特别是脑，与外界事物相比有着无数的谜团，我们是没办法解剖和检查的。最终，我们可以关注躯体外的世界和精神世界。下面这句话是潜意识追寻同意的原因，也存在于所有的学科当中：在一些较高的抽象水平上，相同的概念能够完全使用，这也是一个多变和不断重复的论点。

认同理论时常会导致唯物主义一元论，尽管唯物主义一元论强调精神和物质是整体中的两个层面，Freud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无处不在的认同理论倾向似乎有着潜意识的根基。对于躯体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却又如此陌生，因为我们无法将其视为一个客体而去探查其内部的究竟。我们的身体比起外在客体更让我们迷惑，至少外在客体我们还可以解剖和研究。

最后，我们采取一个外部定位将自身和躯体智力区分开来。这也许与所有科学分支普遍存在的，统一化的潜意识相关；一些抽象水平

很高的概念也适用于相类似的概念。这是一个广泛争论，不断重复的论点，Adorno (1972 [1955])曾引用其对社会学和心理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批判。

## 影响和评估

我们认为对本能能量的批判开创了精神分析的新维度。一个鲜明的反对观点称，背离本能理论的精神分析分支多销匿于无形了 (Adorno 1952);其实这种损失是可以避免的。这也许与诸多精神分析师将潜意识与本能能量等同起来有关。抛弃经济观点也导致了对本能理论的否定，这就抑制了分析师在对来访者潜意识进行想象。毕竟，在治疗过程中要取决于诸多因素，我们关于动机驱力的观点对潜意识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即使本能理论的经济观点已经消退，精神分析的启发将始终源于快乐原则和动力性的潜意识愿望。Freud的本能神话似乎是对真理的隐藏或是一种隐喻的表达，本我能被理解是一种在人类幻想中取之不尽的资源，它完全可以超越时空以及现实的限制。Adorno (1952, p.17) 阐明了，在精神分析中力比多被认为是“真正的精神现实”。将力比多概括为一种意向性就剥夺了它最基本的动机驱力，人们正是想证明这种驱力也体现在躯体存在。因此，从对性欲理论的经济观点的评判中，就有很好的理由可以做到将洗澡水倒掉的同时不会将婴儿也泼出去。Adorno的观点是正确的。将精神分析修订和社会化了之后，它就可能倒退到阿德勒学派的那种浅薄水平。阿德勒用简单的自我心理学去取代Freud基于快乐的动态理论 (Adorno 1952, p.2)。

神经生理学和精神分析临床证据以及最近关于母婴互动的发现都证实了，所说的精神能量调节快乐和痛苦体验，这个经济学原则和假设是站不住脚的。令人惊讶的是，Freud理所论提议躯体与心理过程的相似之处其实并不存在。如果隐喻的暗示作用让分析师们实践于一个没有对照的领域，那他的分析行为也不会是恰当的。理论危机深深影响到了分析实践。

驱力理论重要性的丧失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精神分析动机理论，精神分析动机理论是考虑到生物传递的不同种类的基本需求。例如Lichtenberg (1983a,b)认为动机理论可以取缔驱力理论。伴随着不寻常的二元论（力比多与自我保护；生存驱力与死亡驱力）Lichtenberg发明了具有五大系统的激励理论。

- 1.生理需求需要心理调节。
- 2.依恋的需要。
- 3.探索和坚持的需要。
- 4.厌恶反应的需要。
- 5.性享受和性兴奋的需要。

这个“系统”重新对这些需要进行了定义，更多的考虑了环境属性。

## 1.4 隐喻



## Freud对隐喻的使用

Freud的背景是19世纪后期的神经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他借用了这些领域的文献，为当时他所探索的新的、不熟悉的领域提供帮助。我们还是应该听取他的警告“当我们需要一个心理学事实的氛围去帮助心理学概念形成框架的时候，就要抗拒内分泌和自主神经系统的诱惑” (1927a, p.257, 新增重点)。你会在**答外行分析师问**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一书中看到, Freud点出“真正的分割线……科学分析及其应用之间的分隔就类似于医学与非医学领域之间一样” (p.257)。这句话成为他关于不可分隔的纽带的一句名言。它是用“没有……逻辑”将“医学[即, 治疗的] 与应用分析”区分开来 (p.257)。

因为比喻性的描述多停留在非心理学概念, 甚至许多超心理学上面——这是不符合Freud的要求的(然而, 这也是做为先驱的他对自己早先的推翻过程)。

Freud所用的隐喻——兴奋 (excitation), 释放 (discharge), 投注 (cathexis), 连结 (bond) 等等——都源自19世纪的神经生理学。当然, 像这样用隐喻本来就是无可厚非的; 它们是所有科学理论的组成部分 (Grossman and Simon 1969; Wurmser 1977)。就像Grassi(1979, p.51ff。)在他关于概念历史发展的讨论中所表明的那样, 隐喻将意义从原始(熟悉的)客体转移到了继发(不熟悉的)客体身上。正如Freud又一次写到, 这种隐喻自身并没有贡献作用, 但却帮助分析师们在新的位置的领域找到家的感觉。如此, Freud很自然地就从神经病学中引入这些做参考, 例如在对精神结构和反射弧或者对潜意识和本我的

描述中，就用“一大锅沸腾汹涌的兴奋，激荡不已。”来进行比喻，这只是他创作的诸多关于经济和数量的引隐喻之一(Rubinstein 1972)。

基于实践和理论的原因，我们有必要明确隐喻的类似性可以延伸到什么程度。很重要的是能用隐喻来区分共同特征和现象差异，也就是说，确定类比所带来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Hesse 1966; Cheshire 1975)。一个恰当的比较能更好的揭示出其中的相似性。但是，另人印象深刻的隐喻可能仅具有很高的解释价值，因为它可能让人们忘记去细看那些差异性，即不同之处。Freud所创的那些隐喻至今还让心理分析师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J.Edelson 1983)。虽然不恰当的隐喻已经被作为理论修正所遗弃了，但在不恰当隐喻的差距在哪里，一直没有得到澄清。甚至可能许多由Freud创造的隐喻都是基于同构的概念，也就是说对等价的条目进行对照。不然他也不会谈到（事实上是希望的表达），精神分析的术语有一天可能随着唯物主义一元论被标准的心理学和化学术语取代(1920g, p.60)。

更复杂的是，精神分析的隐喻许多都来源于从19世纪神经生理学，至今还具有科学价值，但在神经生理学的学科中，它们早就因为没有充分的实证基础而遗失了。这些古老的术语实际上已在精神分析经验和解释中进行了变身。隐喻原本就具有整合的功能，在已知和未知之间搭建桥梁。随后，这些基于隐喻的语言在精神分析运动中为精神分析师的身份形成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新隐喻的出现是可能的。Cox 和Theilgaard (1987)有一个令

人惊讶的想法， 用音乐术语来描绘精神生活 – 例如不和谐音， 重复旋律， 同音e等。 如果这有益也未尝不可。

“好的临床医生长期以来对这些没有用尽的隐喻都留有一手... 这样我们需要具有认识这些传统理论所用隐喻价值和局限的能力， 同时我们也需要勇气去使用一些新的隐喻，” Buchholz (2000, p. 64)写到,并且我们认为他的观点正确的。

## 创造人工词汇

我们现在来看另外一个语言问题。 Brandt (1961, 1972, 1977), Bettelheim (1982), 和 Pines (1985) 断言, 当前精神分析的大部分问题都可以追溯到Strachey的主张, 即, 用人工机械英语来替代Freud的隐喻和拟人化术语, 给科学界一个完整的氛围。 Strachey的翻译有着大量的缺陷和明显的错误, 这些已经存在于一些德语分析师身上, 毫无疑问, 他用充其量只是空话的经典学术语来代替Freud那些清晰和生动的术语。但这种备受指责的理论问题会对分析实践产生深渊的影响么? Ornston (1982, 1985a) 还猜测之所以Freud表现出如Jones (1959, p. 23)所描述的“在翻译问题上的傲慢态度”, 是因为他十分想保留对生活用语联想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Bettelheim的批判也可以从如下的翻译中看的出, 将德语 *Besetzung* 和 *besetzen* 从“投注” (cathexis)翻译成“集中欲力” (to cathect)。 相比于Freud之前的术语(*besetzen*: 占据, 填充), 这些英语单词对一个门外汉来说根本毫无疑义。 但Freud所谈的*Besetzung*到底

有什么含义呢？在大英百科全书第十三版中收录了他的文章，“精神分析：Freud学派”，其中写到：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精神分析假设本能的心理表征是释放(投注)一定的能量，这也是心理结构的目的，阻止这些能量因储藏过多而形成的抑制，同时也保持尽可能低的兴奋。心理过程由“快乐-不快原则”自动的进行调节；不快在某种程度上与兴奋的升高与快乐的减少有关。(1926f, pp. 265-266)

Freud采用了“投注”(cathexis)这个抽象的词汇。重点是在Freud经济原理假设的基础--无论用德语，英语还是其他语言--精神分析师们力图用一些怪诞的公式来描述“投注”(cathexis) (e.g. , Bernfeld and Feitelberg 1929, 1930)，或者是例如描述错综复杂的力比多变化 (e.g. Hartmann et al. 1949)。更绝的是，有的分析师常草率的将解释力归咎于“投注”这个术语，而仅仅是因为这个术语看上去更有定量的感觉。这对精神分析实践的这个领域都有所影响，例如用定量的概念来解释由不断紧张导致的沉默。Ricoeur (1970)在这方面做了详细的工作，其中他谈到定量释放理论弥漫到各个领域，甚至是Freud的解释学方法。抛开翻译错误的问题，新的词汇都蕴含着随后会暴露的问题。Freud不喜欢科技术语，1922年 Strachey用“投注”(cathexis 源于希腊语)来取代德语的*Besetzung* (占领) (见Freud 1923b, p.63)。他在《自我与本我》的序言中写到，Freud终有一天会使用“投注”这个词，因为Freud已经将它收录在德语的大英百科全

书中了(Freud 1926f, p.266)。关于Strachey是怎样采纳这个术语的, Ornston (1985b) 发表了一篇更详细的背景介绍。一般的德国读者可以猜到*Besetzung* (占领) 这个词的分析含义, 因为Strachey将这个词转化为新领域中的不同专业含义, 既是理解这个术语的隐喻。不然, “投注”(cathexis) 这个新词的含义就只能被希腊的传统学者所理解了。

重申我们的观点, 像Bettelheim 和 Brandt谈论Strachey创造新词“投注”或者是他将*Ich* 和 *Über-Ich* 翻译成拉丁语"ego" (自我) and "superego" (本我) 对新兴的问题负有责任, 这个评论是不正确的。相反, Strachey的翻译所暴露的问题早就存在(Ornston 1982)。这里的问题是解释性精神分析理论与病人主观体验的关系。Freud在入门讲座中解释了他的立场, 即从描述现象过程出发再到精神分析解释过程:

我们寻求的并不是简单的描述和现象分类, 而是去理解心灵力量的互动, 入目标意图工作的并存或是对立。我们关注精神现象的动力性观点。我们的观点认为感知到的现象必定要赞成假设趋势的重要性(Freud 1916/17, p.67)

从这个角度出发, 使用拉丁语 “ego” 和 "superego" 比直接英语翻译*Ich* (和 *Über-Ich*) 要更为切题。无论分析用ego或是*Ich* 都能表达自我的含义。在引进Ego和Id的过程中, Strachey明确的表明Freud用*Ich* 这个词表达不够明确:

这个术语在Freud时代之前就已被沿用；但在他早期著作中其特定含义是模糊的。它可以由两个用途：一是将自身与他人区分开，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二则是想用来表明具有特殊属性和功能的心理特定结构。(Strachey, in Freud 1923b, pp. 7-8)

Freud尝试用心理理论来解释个体的主观经验。所以即使改进了德语原版的翻译，也不能对理论问题的解决提供帮助。

### 名词的使用：“Id”(本我)

无论是英国，法国，西班牙还是德语社会和文化背景，都对我们理解“Id”起着一定作用，也帮助我们回答Hayman的提问：“我们所说的‘Id究竟是什么意思’”(1969)。然而，Breuer于1895年与Freud联合出版的文章中强调，这个名词无论在任何语言中都存在一定的风险：

个体很容易对一个名词的背后实质进行心理评估，或者用术语和意识来进行不断的构思。如果能形成类似于“潜意识”隐喻这样对关系进行联系的习惯，个体的思想就会不断的发展，随后就将隐喻的部分遗忘，而去能去掌握它的真正含义。神奇就是如此产生的(Breuer and Freud 1936, p. 169)

事实上，Dilman (1984, p. 11) 高度重视哲学层面，而Breuer'在这方面思考的不够充分，导致他对反对物化的警告少之又少。

## “它”的代名词

当一个德国人听到单词“它”(Es),他首先想到的是一个不指代人的名词“它”(It),这个词在德语中用的比较广泛,常作为句子主语来表达情感(例如:我很抱歉es tut mir leid: I am sorry) Kerz (1985)指出,虽然尼采所有的批判思想都是针对物质的,但当他想排除自我意识收缩的时候,他也没有回避去提及愿望,权利,生活,力量等等。虽然到处都是警告的气息,但是名词都会越来越具体化,因此id这个词也蔓延到整个人类属性的范畴。

在使用隐喻的时候难免会用拟人的手法,这是在衡量一切事物和探索自我的时候不自觉地使用的,特别是隐藏了的愿望和意图仍然是人类本性的潜意识部分,即本我。虽然Freud采用了物理主义的术语,他还是为名词Id赋予了物质属性,他使用大量的拟人化比喻去解释潜意识过程。然而,一旦超越这条界线,在生理病理过程中本我的疾病与本我的平衡只有一步之遥。在浪漫主义时期和人生观对Id的理解中——尼采的Id——变成了 Groddeck的心身id,神秘的宇宙科学,贪得无厌的渴求,都几近消逝。

## 思想史的背景

我们所说的"id"指的是神秘?如果一个人熟悉思想史对Freud决策的影响的话,这个问题就会有更满意度回答,其中包括,Freud延续尼采对单词“Es”的使用。比起英语读者对“Id”的理解,一个熟悉思想且说德语的人史将会对“Es”有不一样的自由联想,但是英语,法语和德语版本的精神分析理论都远离了病人的自由联想。

Bettelheim (1982) 职责拉丁语中的许多基本术语和许多病人相对而言低教的育水平（一个人，没有像维也纳资产阶级那样受过教育，对经典神话也不尽了解，例如俄狄浦斯情节等）事实上在他看来精神分析丧失了Freud所主张的任性部分，并且变得抽象起来。

我们认为Bettelheim的论据是一个误导。 Freud的理论，或者任何别的理论，明显基于主观经验并在实践中去应用，从来不会取决于病人是否听过Sophocles（古希腊悲剧诗人）的戏剧。事实上，病人知道的越少，治疗和学科发现就更具有说服力。Bettelheim的批判不适用与精神分析理论或者说不适合现代的一般病人，仅适用于将当时将本我理论应用时所采取的方式。理论当然多少都有些机械论的色彩，拉康于1968年在论文中所提及的潜意识的构成可能与语言的构成具有相似之处，相比拉康而言，Freud的理论中，置换，凝缩和可塑表现这些最为重要的潜意识过程更具有机械化特性。关于潜意识过程的理论命题，包括抑制这样的过程与分析师的人性反应没有直接相关，但当精神分析方法处于治疗应用当中的时候，人类的共情就变得意义重大了。寻求问题解决的同事也需要专业职责，我们在第十章对此进行了概括。

### **具体和抽象之间的关联**

最后，应该强调为什么在精神分析对话中要突出使用隐喻，为了将具体和抽象之间进行连接(Wurmer 1977)。此外，对异同的区分也是治疗中的常数因子(Carveth 1984b)。Arlow (1979) 将精神分析称之为一个隐喻过程，因为移情这个精神分析的典型现象，可以追溯到隐



喻过程中，也就是将一个意义从一种情境中转移到别的情境中。在第八章第四节我们会重点讨论移情解释。

## 1.5 培训

### 临床实践取代基础研究

精神分析学院已经无法维持治疗和研究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Freud的理论遗产主要通过培训传递给治疗师，而并未像Freud模型对精神分析学院所期待的那样，经由适度的系统研究或者临床实践来教学。沟通不畅的情况也由此产生，但最初它被二战之后美国精神分析如火如荼的发展所掩盖。公众对精神分析的接纳促使许多年轻医师选择精神分析师作为专业方向。新的培训中心如雨后春笋般林立。精神分析的概念构成了动力性心理治疗和动力性精神病学的基础（见Sabshin, 1985）。但对精神分析的基石——对分析情境的系统研究，还并未得到相应的发展（Schlesinger, 1974）。

在美国，在少数非医学背景的治疗师因其天分而被跨学科研究领域所接纳为研究员之后数十年，如今不仅是精神病学家可以进入精神分析培训和实习，心理治疗师和越来越多有资历的社会工作者也被纳入其中。因此，一眼看去，最经常被抱怨的沟通不畅的情况不再理所当然。这是因为“医学教条主义”（Eissler, 1965），或者“医学中心”式的培训（Parin和Parin-Matthey, 1983a）。然而仔细考察，比较准确的

说法是，培训的目的仍然保持与公认标准效果一致，不管基于什么基础专业领域，因为无论在哪个国家，培训都是提供给非专业人士（包括非医学背景的研究者）。每一个培训中心都转向了精神分析导向。标准技术中的特定限制被误认为适用于大范围病人的治疗。我们推荐，如今的培训应该涵盖各种不同设置和强度。选择的标准取决于经验证实，精神分析治疗工作是否有益于病人（Fonagy等，2002）。为了克服精神分析临床应用和由此衍生出的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之间的分裂，“精神分析性治疗”这样一个泛指的名称重新让精神分析学派的努力回到聚光灯下（Kaechele，2010）。这样的位置理应鼓励受训者尝试以不同设置来治疗不同病人，学习和研究针对特定病人群体发展出来对应的精神分析技术（如Clarkin 等，1999；Bateman & Fonagy 2004；Milrod等，1997），进一步提升自身对精神分析治疗理论框架下一些基本原则的理解。我坚持抵制这样的说法，即认为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之间基础理论和原则有本质不同。这一说法会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无法看到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培训不仅需要考虑到障碍导向的治疗对策，也需要考虑与治疗有关的缓解因素（Luyten 等，2006）。如果精神分析仍然希望保持他们声称的“领头羊”位置，就需要用事实来说明，我们可以提供各种精神分析性的治疗，满足不同病人的需要和倾向。我们所提供的精神分析性治疗是“无评判性的，稳定但不失变通，支持性兼解释性，融合事先计划与自发过程于一体”的。

## 学科交叉

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所有非医学背景的精神分析师都放弃了他们先前的专业，只有非常少数还活跃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或者致力于他们原先学术领域和现在专业的交叉研究（Thomä, 1983b）。好在值得庆幸，在非医学背景精神分析师中，还有一个例外的小群体。他们在接受APA提供的培训之前就是有资历的科学家。良好的外部环境促使这个群体中大部分分析师都在跨学科领域研究中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而得益于精神分析，他们也维持了在原先领域中的竞争力。这才是培训的目的所在，它打破所谓“医学”的限制和教条主义。纵然对医学领域这样的误解由来已久，但其实在其他所有医学领域，人们都尽可能鼓励基础研究，只是在精神分析培训中，对实践的强调被贴上了“医学中心主义”的标签。

一般或具体的科学质疑，包括在精神分析研究中的质疑，打破了一系列各种各样的教条主义。这一过程把精神分析导向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合作。Freud强调过：

精神分析在医学的众多原则中独树一帜，它与精神科学紧密相关，并且...它在宗教和文化历史，在对神话和文学的研究上与精神科学同等重要。当我们想到，精神分析最初的对象只有对精神症状的理解和加以改善，这似乎有些奇怪。但这却是最简单的方式，向我们指出精神分析通向精神科学的起点。梦的分析给我们提供了窥探潜意识过程的机会，向我们展示了产生病态症状的机制在正常心理过程中也同样存在。因此精神分析转变为一种深度心理学，并有足够能力应用于精神科学。（Freud 1923 a, pp. 252-253）

为了努力给予病人整体而充分的治疗，医学必须动用“全部”科学，来了解，减轻，治愈病痛。从这个意义上说，精神分析方法只是其中躬亲竭力的一种，而且它并不推崇权威，而是以病人为主导。除了已有的那些准则，精神分析一直（并继续）在争取自身权利，确定其活动和研究范围，以及根据病人和社会的利益来工作。

精神分析长时间一直是所有学科里最不受重视的一种，Freud也在努力保护它，防止它被收编到精神病学的门下。但这些努力却阻碍了精神分析实践和相关研究的发展。Eissler（1965）对精神分析研究中心从大学和医学部里分离出来表示欢迎，但实际上这一分离正是导致他诟病已久的医学教条主义的原因之一。教条主义的态度在科学化的医学领域不会存在很久。当然，有治疗实践做基础——和其文化理论的来源，精神分析有足够的理由保持它医学中心的特质。尤其是科学调查，显示了精神分析的学科交叉地位及它对相邻科学领域学术交流的依赖。精神分析性导向可以有效的应用于人文学科。然而，站在精神分析的立场上，不管是心理学还是文化理论，所有学科交叉的合作都会导致精神分析自身影响力的削弱。在所有最近几十年成立的精神分析学院派研究小组中，各种类型的意识形态都被打破（Cooper 1984b; Thomä 1983b）。正如提倡将培训机构和大学结合的坚定支持者Cooper在法兰克福DPV成立50年年会上所言，试图为精神分析在学院领域中寻找一个合适的定位：

新生的替代理论爆炸式的发展，指明了可能的前进方向。最大的可能是，我们以分成不同学派而告终，就如早年Adler，Jung和Freud，或者像是如今这些

不同学派。这并不见得是个坏消息，但正如我已经说过的，精神分析不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我们的未来将决定于我们发展智力敏感的能力，从而超越这些不同的学派之见。而目前还处于早期阶段的科研方法论，只能由未来的发展来完成。（Cooper 2001, p. 76）。

## 学术化的结果

导致学术僵化的原因并不是精神分析学院的独立，而是它单一的特质。持这一批判观点的人中，A.Freud（1971）是最著名的一位。Kernberg在其一系列文章中（1985，1986，1996，2000）写到，不管是结构还是功能，精神分析学院更类似职业学校和理论研讨班，而非大学或者艺术学院。这样令人不满的状态随处可见，即使在标榜自由，脱离（国际精神分析组织）IPA控制，同时提供精神分析和医学培训的那些培训中心，这样的情况也不在少数。A.Freud的批评同时适用于所有在培训中忽略研究，实践经历仅限于少数督导案例的培训学院。最近几十年来不断增长的培训时间和相对密集的督导也并没有导致学术僵化得到任何根本性的改变。

这里我们无法对培训和督导这样复杂的问题展开更详细的讨论，但值得深思的是，病人疗程的长短与咨询师的培训时间成正比。培训和督导因此成为衡量培训机构是否提供纯粹、严格、正统精神分析的决定性因素。Glover（1955，p.382）很早之前就开始关注这种对数量超乎寻常的褒奖中的自恋因素，比如咨询次数，长达数年或数十年的疗程，以及这两个因素带来的结果。这样的问题在精神分析治疗的教科书中决不能只字不提，因为正是培训和督导影响着实践操作和这门

专业，其影响力比其他所有方面加起来都要多。近半世纪来，长时间的培训和督导已经引发了严重的问题（A. Freud 1971, 1983; Arlow 1982; Laufer 1982; Kächele & Thomä 2000; Target 2003; Thomä 1993, 2005; Thomä & Kächele 1999）。

### 观念的变化

如上所述，多元化的培训将会导致多方面的变革。许多人相信目前关于理论、实践和参训资格的争论，反映出学术专制的终结（Eisold 2003; Kernberg 2000; Renik 2003; Richards 2003; Wallerstein 1993, 2003）。

值得期待的是，IPA组织内外，都有许多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因此在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冬季会议上，Kernberg的最新演讲标题即为：

“精神分析教育中即将发生的变化”（Kernberg 2005b）。期待未来的变革能将Freud的“三位一体”假说与培训，治疗和研究相关联，这也许不算太过乐观。这基于学术派的“三位一体”回到了Humboldt的理论，同时也是柏林学院Eitingon-Freud模型的基础。研究中心在纳粹时期遭到关闭，世界范围内，科学客观性和精神分析的社会实践也同时遗失。Balint（1948,1954）极富远见的指出这一遗失的致命后果。显而易见，传统学院的夜间课程已不再够用（A. Freud 1971; Holzman 1976; Redlich 1968）。并非巧合的是，精神分析在有学院机构扶持的地方，显示出了蓬勃的活力和创造力。例如Kernberg, Michels, Cooper等人的学术之家，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哥伦比亚精神分析中心，即是如此。在我国，A. Mitscherlich因其学术地位而成为战后德国精神分析

的第二创始人（Hermanns 2001）。现今从事精神分析的大学教授，其杰出才能已不再被精神分析学会予以特别表彰，然而，一旦谈到经验性研究，与大学合作就成为必要。DPV的跟踪研究（Leuzinger-Bohleber等，2003），海德堡的PAL研究（Rudolf等，2002），慕尼黑心理治疗研究（Huber和Klug 2004）以及哥廷根的研究（Leichsenring等2005）都说明了这一点。

### 精神分析的能力

尤其可喜的是，最终，精神分析的能力和适当的评估方法问题已经获得其科学地位（Sandell 2006a, b; Sandell等2007）。如果我们不需在培训全程给学员们打分---这大部分只说明了他们分析培训的长短和频率---而是像Spence（1981b）一直以来构想的，最近又被Kernberg（2005b）重新提到的，像音乐家那样通过客观标准：比如辨音能力来评判，这将给个体以一定程度的自由。完美的例证即是东欧精神分析的飞速发展，多种多样的培训机构，包括培训分析对此贡献巨大，也证明了对精神分析培训予以实用性改良而不失本质的办法是可行的。Tuckett（2005）建议，应该发展督导和培训报告的系统评估，将两者引向同一方向。他提出一个参考的方案，将培训项目的评估纳入精神分析多元化下的监管机构框架。

### 1.6 方向和前景

□ 在自我心理学，克莱因学派和客体关系学派之间

精神分析越向前发展，要让各个不同学派之间达成对基本理论的

共识就越困难。这些变化早在19世纪30年代（Riviere 1936; Waelder 1936），在维也纳和伦敦精神分析师们的讨论中就有所预示，并在之后25年里逐步得以体现。Pine（2005）提出4大精神分析性心理学：动机心理学，自我心理学，客体关系和自体心理学。之后的版本又添加了主体间或者人际（关系）心理学。

结果是两极分化。尽管我们应该铭记于心，Gabbard（2005）曾在小组报告的场合说明：理论概念应用的各己之见比归属于不同学派的事实导致了更多的不同见解。以两大导向对关系的不同理解为例，一方面，Rapaport（1960）曾说，心理社会因素和之间关系在精神分析性自我心理学领域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理论，另一方面，这位作者也同时对M.Klein（1945,1946,1948）的客体关系理论大加嘲讽，称之为本我的神话。本我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地位是决定性因素。尽管Freud（1923b）曾认为，自我深深扎根于本我，但在Lacan的影响之下，自我心理学疑似太过表浅（Kernberg 2002, p.16）。因此Pontalis（1965）提出质疑，美国式的自我心理学是否并未真正打破例如潜意识等基本概念，只是方便了精神分析的教学。

Erikson将自我心理学理论与美国哲学家James, Cooley和Mead以及他们关于心理社会认同和自体感觉如何形成的著作相关联，而扩展了自我心理学的理论范围（Cheshire 和 Thomä 1986）。Erikson概念的未来命运，尤其是有关青少年的部分，由Bohleber（1992）做过详细描述。



Klein的早期儿童发展理论以及她推荐可以不经分析阻抗就使用深入解释的说法，是对A. Freud《自我和防御机制》（1937）中自我心理学说的明显悖弃。在伦敦，介于这两个极端学说之间仍有中立的学术团体，而北美精神分析组织则延续了自我心理学的传统（更多详细的批评见Kernberg 1972）。克莱因学派和自我心理学派之间的争论仍在继续，但已经锋芒不在。大多数精神分析师对待理论和治疗技术的观点都越来越中立平和（Schafer 1990）。在最近一次德国广义精神分析学会（DGPT）的重要讨论上，Kernberg（2000b）指出，Gill对克莱因学派阶段性的批评只是指向了克莱因学派三十年前的应用技术。Gill认为，当今的克莱因学派学者们看到了在“此时此地”分析深层潜意识意义的必要性（p.314）。Thomä（1999）在回顾这一评论时指出，克莱因学派和Gill在对“此时此地”的理解上有明显区别，然而这一点却因为克莱因学派的学者没有任何录音资料而无法证实。

正如我们之后要说明的，随着依恋理论（Fonagy2001）的逐渐影响，一个重要的理论修订已蓄势待发。无论在正常发展还是在病态发展中，早年客体关系都被看做是关键的纠正变量（Person等，2005a, b, p.XV）。而结果却发生了并未引人注意的变化：那些并不认同抑郁阶段——狭义理解为一个正常的过渡阶段——的学者，接受了抑郁性反应贯穿生命最初的一年。

这一意义上的变化也同时应用在了攻击角色里，Klein（1935）认为攻击是从死亡区里中演化而来，并冠之以早期阶段感情发展驱力的盛名。Parens（1979）在发展心理学上的发现则将挫折-攻击理论放

入分离体验的情境中，比克莱因学派缺乏经验实证地发现更具可信性。并且，克莱因学派以死亡驱力为导向的那些分析，其治疗效果也从没有对比研究的文献可查。不过，克莱因学派对发展过程和症状形成中的攻击现象予以关注，仍有其学术价值，虽然这也正是饱受批评的一点（Scharff 2002）。考虑到上述这些变化的意义，克莱因学派也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理性，承认那些拒绝以死亡驱力为基础的假设的成员。Jacobson（1964）还给出了超我形成的起始时间和早期超我结构对后来心理发展的意义，例如两岁左右。关于俄狄浦斯冲突的年龄被提前到两岁到三岁，前俄狄浦斯因素和冲突对性心理发展和性格形成有影响的观点也被广泛接受。

自然而然，当学术思想融入一般精神分析理论后，学术派那种一边倒的局面已然不在。理论融合不可避免的包括相互影响和渗透。Klein的早期防御过程假说对解释分离过程影响深远。Kernberg认为，这里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对分离过程的解释，它澄清了负性治疗反应的发生机制，即它是无意识嫉妒的结果，补充了Freud对这一现象的理解。

#### □ 有没有英国学派？

语义混淆有时会打破固有传统，制造出新的有影响的表达。比如英国学派这一命名就是如此。Klein和英国学派也影响着客体关系心理学派的信徒，比如Balint，Fairbairn，Guntrip和Winnicott。然而，Sutherland（1980）强调了这四位克莱因学派和英国学派精神分析师

的独立性，他称之为英国客体关系理论家。Balint名至实归，他的理论使得分析师可以在治疗中引入两至三个人，早在1935年即强调“关系”对婴儿发展的重要性。Klein认为客体——母亲及其替代者——主要是由婴儿式的幻想和投射构成的。与之相反，Balint认为交互性才是客体形成的基础。

比起其他相互交流理论，我们倾向于Balint的双人或三人心理学。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在此希望通过对比Balint和其他粗略看去大体相似的理论倾向来加以解释。Balint（1935）对一段关系中会发生什么并未给出明确答案。他认为某些移情和反移情是与特殊人格相关的，而分析师自身的理论背景也会影响分析情境。Balint认为，成人的内部冲突会反映在人际关系中。他的这一观点将他和Sullivan（1953）的人际关系理论区别开来，比起Balint，Sullivan忽略了病人的主观体验和内在需求。Balint与Langs（1976）的双人场理论也有显著区别，最大的差异之处在于，Langs认为存在意义和双人场的结构取决于投射性认同和内设性认同的过程，这是明显的既定事实。Langs和其他人坚信他们已经对在分析情境中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尤其是这些现象之后的原因，而Balint则对很多问题留有余地。诚然，没有分析师可以脱离理论概念的影响。然而Balint总是强调他的看法只是暂时的，并强调观察者立场的重要性。这种相对客观的态度是Balint之所以反对教条，并未成立任何学派的原因所在。他的双人心理学与科学发展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相对应。

### **精神分析技术的变革**

我们现在要讨论另一个重要主题，精神分析实践变革的表现。客体关系心理学的出现可以部分看作是一个标志，病人由于不断增长的基本焦虑而寻求分析师支持。这不应单纯看作是对婴儿式期待和沮丧的简单重复，而正是因此，打开了精神分析阐释技术应用于那些由于未受关注的“此时此地”而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领域的可能性。在我们尝试整合的过程中，我们通过了解学术极化如何产生，也从中获益良多。现在我們希望通过几个突出的案例来说明，精神分析技术是如何走到现在的位置的。

关于治疗理论的两大国际会议，1936年的Marienbad和1961年的Edinburgh，就处于这个变动的时代之中。那时不仅是治疗技术，精神分析领域发生着更多的改变。Friedman（1978）曾对这两次会议加以透彻的分析比较。Marienbad会议时，还仍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但到了1961年，Edinburgh会议的气氛就转向了封闭对立：

对立的气氛一直贯穿会议，将它与Freud的著作和Marienbad会议完全区别开来... Marienbad的参会者没有任何故意忽略一条禁忌之路的迹象；甚至提到病人和治疗师之间互动的未知之处时，他们也觉得可以接受。而之后，是什么让Edinburgh的参会者如此谨慎？学术见解怎么就变成了战争宣言？（Friedman 1978, p536）

我们相信，学术见解转为战争宣言是因为广义上的精神分析使得精神分析需要重新定义自身特性。精神分析的概念已经不再局限于主流，行为疗法和罗杰斯的来访者中心疗法崭露头角，成为有力的竞争对手。各种疗法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这种双重的压力导致了内外界限的设立，最终Eissler（1953）发表了《基础模式技术（basic model technique）》，这一天才般的精神分析方法将其推向顶峰。有趣的是，在Aichhorn的纪念文集中，Eissler（1949）还仍认为只有对少年犯的治疗才是真正的精神分析。甚至在他对Alexander的芝加哥学派（1950）的批评里，他还宣称，精神分析治疗包括每一个通过心理治疗手段寻求或导致结构性转变的技术，不管它是否每天需要还是不规则的出现在咨询中，也不管是否使用沙发的设置。

简而言之，其目的不仅仅在于利用简易或其他方式达到任何形式的改变。Eissler的要求意味着治疗方法的效果应该体现出精神分析理论的精确，因为理论来源于内在精神结构的发展。通过对因的精神分析疗法和症状改变的过程可以推断出精神和身心疾病的来源。因此，除了对Alexander操纵矫正情感体验的强烈批评，Eissler还是最先支持开放，维护Marienbad精神的人。直到1953年他发表《基础模式技术》，里面唯一的技术就是解释（Eissler 1953, p.110）。经典精神分析技术因此成为“一个有且只有解释技术的工具”（Eissler 1958, p.223）。这一技术在任何地方都不再是正宗的形式了。Freud并未遵守Eissler的规定，而是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工作道路（Cremerius 1981）。

### 正统理想方法的局限

之后设立的界线看似能让分析师将经典技术与其他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方法泾渭分明的区别开来。精神分析实践中的所有变量都被忽视：病人的症状和人格结构，分析师的个人差异等。另外，甚至

Eissler也认为, 考虑这些变量, 可以适当的调整治疗技术( 1958, p.22 )。

《基础模式技术》不但剔除了除了解释技术以外所有其他的变量, 还创造了一个神话, 正如Eissler自己在与Loewenstein的一次讨论中承认的那样: “没有一个病人是只用解释技术来分析的”( 1958, p.223 )。

Von Blarer and Brogle (1983)甚至将Eissler的文章比作Moses从山上带下来的圣谕。从科学的观点来看, 对Eissler在《基础模式技术》中要求的“纯粹方法”, 至少没有任何异议。然而, 总的来说, 这只不过是对原先技术更细致的规定, 而完全未提及这些规定在实践中的意义, 在何种条件下符合, 什么地方不能使用的彻底调查。基础模式技术的唯一功能就是, 它充分的满足了将经典技术从其他技术中区别出来的要求, 就算其他技术有经验性研究的支持也无所谓。

### 当前处境

Altmeyer ( 2004, S.1111 ) 曾经问到: “精神分析会走向哪里?” 如今的流行观点是, 这是一个新的起点。Sandler以其对未来方向精准的直觉, 预言道: “精神分析师在实践里用的, 才是精神分析。”( 1982, p.44 )。这一实用主义的定义, 虽然简洁至极, 却忠实的反映了多种多样的精神分析实践。事实上, 这一定义也广泛适用于病人和一般人群。我们现在谈的是实践本身, 及外人眼中的实践, 而非常规标准或者理想中的实践模式。Sandler曾说, 好的分析师根据案例不同来调整技术, 并以此支持他的论点, 因为什么最适合病人的确因人而异。如果一个病人只能一周来一次或两次, 治疗师就要据此对治疗技术做相应调整。所以精神分析态度成为了决定性因素。而关于常规标准比如

咨询批评，疗程长短，是否使用沙发等问题的争论永不休止，一直未有满意答案。

### 精神分析态度的获得

不可避免，我们面对着这样的问题：分析师是什么，精神分析态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 Schafer 1983 )。问题转向了培训。Sandler相信，经典技术的教学创造了发展精神分析态度的最好条件，即分析师不会内化精神分析，而是寻找自己的个人风格，直到他在个人诊所里有了多年的经验。个人的经验绝对没有任何可以替代，但如果变通成为评价治疗师好坏的条件之一，则实践准备工作也要相应计划。很难说这还算是基础模式技术——例如，禁止分析师提问或回答问题——意味着其精神分析态度与Sandler对好治疗师的定义相符。但Sandler对质性方面的强调并不意味着量化方面就完全无关紧要。时间，规律性，疗程长短，治疗频率都是重要因素，并且许多结果都依赖于这些因素。但不管怎样，它们无法决定质性方面发生了什么，因此也不能作为衡量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之间区别的标尺。

Wyatt ( 1984 ) 不认为精神分析标准技术和分析性心理治疗可以互相替代。如果有人这么认为，那么Wyatt在长期研究后得到的结论就很重要：如果通常一直到治疗最后才能判断“到底他是在做真正的分析，还是实在的心理治疗” ( p.96 )，就应该了解“真正的”和“实在的”之间的区别。我们相信，对这个问题，未来的澄清会因专业见解和学术兴趣相混杂而更加复杂。学院派精神分析转向教条，热衷与在会议桌上划分界限。而能启发我们，导向真正精神分析的经验性研

究反而无足轻重了。

在个人诊所，分析师逐渐形成了连续的整体：无法划分出明确的界线。用基础模式技术来治疗病人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从并不存在的病人身上制造出的幻想。正如Menninger的研究显示，精神分析的特殊方法就算一再被强调，还是在解释移情和阻抗的指导下，被纳入了支持和表达性技术（如，揭示冲突）的网络。Kernberg（1984, p.151）建议将精神分析，揭示冲突（表达性）心理治疗和支持性心理治疗区分开，标准建立在下列维度表现程度的基础上：（1）主要的技术工具，例如澄清，揭示，建议，和社会环境中的干预；（2）解释移情的密集程度；（3）技术中立性的保持程度。我们对形形色色的精神分析治疗师是“亲密家人还是一般邻居？”（Grant&Sandell 2004），只有通过经验研究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在技术和疗效上的数据不同才可知道（Kächele 2010a）。

分析师将自己从界限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之后，仍有大片空间等待区分。要将分析技术和学派的独门技术两相比较，以及比较它们和分析性心理治疗的关系，着实是一种挑战。但我们认为，这样的比较研究必不可少（Thomä & Kächele 2007）。如果长年改革被看做是对治疗行为的调整，所有方法技术都丧失了自信的本钱，那么，它们的科学价值也因病人在治疗中获得更少而相对减弱。因此我们希望成功的区分不仅是科学意义上的，更可以在临床使病人获益。除了教学性的个人分析以外，接受精神分析的对象不再关心他们到底接受的精神分析还是心理治疗。病人只是寻找最佳的帮助。最开始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只存在于分析师的心里。我们猜测，经常出现符合Kris（1956a）定义的“成功咨询”，或者经常出现多样化的解释技术（见8.4节）使分析师感到他有能力进行真正的精神分析。其他指标与聚焦的程度，设立的目标有关（见第九章）。分析师的主观体验必须经过研究检验，比较过程和远期分析效果。目前，我们赞同Kernberg（1982，p.8）的观点，“严格区分精神分析理论及其衍生技术和经治疗实践探索出的技术，对精神分析工作本身贻害众多。”因此我们更倾向于包含多维度思考的技术模型（见8.9节）：在每次咨询中，它由互动所控制——不管是意识层面还是潜意识层面——哪种治愈因素（维度）更有利于整合病人的潜意识冲突（Kächele 1994）。

我们将损害定位在两个层次上：严格区分，就如基础模式技术中坚持要求的那样，鼓励正统的，新经典精神分析态度，导致适应症的范围越来越狭窄，并且其基础值是为了得到新知识。但这一领域的局限在于此，因为治疗效果并不只是依赖于分析师使用解释技术的功力。另一层次是分析性心理治疗，充斥着大量的方法试验，变化和更改，但从没有任何研究关注过精神分析中治疗关系的改变，尽管IPA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在十年之前成立了一个研究组织。一篇来自公开资源的文章——“精神分析疗效的开放性综述”——提供了对当前广泛定义的“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评估研究的现状。“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被认为是过去十年大有进展的领域（Fonagy等，2002）。另一份DGPT发表的声明更是肯定了精神分析在德国重要且深远的意义（Brandl et al. 2004）。

## 1.7 社会文化变化

### 与传统体制分道扬镳

有关当前治疗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法，没法通过模仿Freud来解决。就算他对待病人那种宽容自然的精神分析性态度是对刻板模式的一记良药。Freud对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解决方法，只在当时和现在情况存在相似性的时候才能引作参考。

二次大战之后，世界格局出现了深远的变动，地缘政治也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原子时代带来的全球不安定而转型，随之而来，社会和家庭结构的瓦解也对个体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影响还有时间延迟性，历史事件和心理社会因素作用与家庭生活，影响了几代人，并导致个体的精神或身心疾病（Cierpka 2002）。代际传递通过病态的家庭结构实现，这在过去数十年间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尤其在对屠杀犹太人的修通上。大屠杀的经历从第一代受害者传递给下一代，Kestenberg（1989）曾将这一现象命名为：置换经历。Laub（2002）用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中，身为大屠杀幸存者子女的以色列士兵为例，说明了大屠杀创伤是如何进行代际传递的特殊过程。他尤其强调，分析师应该和其他学科背景的科学家合作，尤其是历史学家。这绝对是互惠互利的事情（Laub 2003, S. 940）。然而之后仔细的跟踪研究却发现，代际传递并不总是出现（Kellermann 2001）。用成人依恋访谈的方法，Sagi-Schwartz 等人(2003)发现，当年的直接受害者，现在已成为祖父母，虽然仍显示出创伤后应激的征兆，但无论如何他们都相对

成功的适应了。只是他们会将自身的保护照顾经验传递给女儿。显然，精神分析性讨论没有对已有的流行病学调查 ( Schepank 1987 ) 和发展心理学关于生物学方面的研究给予充分关注。Kagan (1998) 强调了儿童应付创伤经历能力的重要性，他们的“弹性”，德语中也有同样表达。

越来越多的人达成共识，精神健康、躯体健康和/或精神疾病、躯体疾病可因保护因素的存在而耐受，比如生物学基础，亲子关系和社会经济状况。而与之相反，致病因素可以是压力增加，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情感冲突和各种个人危机。

如果我们细究关于精神疾病或身心疾病的发展，我们到底了解哪些个人经历中的保护因素，那么-----根据Hoffmann和Egle ( 1996 ) ——我们必须列举如下因素：

- ☐ 与至少一个依恋客体保持长期良好的关系
- ☐ 大家庭/与父母有补偿关系/不再苛责母亲
- ☐ 早年丧母之后，有好的替代人选
- ☐ 强壮，主动，性格外向
- ☐ 社区支持（比如青年小组，学校，教堂）

更进一步，信任和依恋客体的支持也是重要的保护因素，就算成人之后，其效果也并不减弱（ Buchheim and Kächele, 2006 ）。

在家庭中传递的无意识态度，有其各自的典型内容，符合情感小说的模式。这导致了家庭传统发生变化的速度与历史、社会文化过程之间明显的时间差异。性革命总体上说减轻了对性欲的压抑，避孕药

也在妇女解放中起了很大作用，使她们在性爱中获得了更多主动权。正如精神分析理论预言的那样，歇斯底里不再常见。如今更常见的是俄狄浦斯冲突，而非关于如何调整错综复杂的超我结构。

## 结果

因为精神分析方法主要将自身划归到典型的精神疾病家庭导向，对儿童时期给予特殊关注，心理社会因素对青少年的影响，这一给了他们“第二次机会”的重要阶段(Blos 1985, p.138)反倒被忽视，直到Erikson才开始关注这些问题（例如，Erikson 1959）。多年来，导致症状持续出现的因素，在决定治疗技术时未得到足够重视。这样双重的忽视一开始只有少数副作用，因为早期对阻抗的本我分析和后来的自我心理学导向分析假设，稳定的——甚至难以改变的——心理结构形成于早期阶段。分析师帮助病人得到更多内心自由：压迫式家长制导致了严格的超我戒律，而分析师则以更人性的价值观取而代之。Strachey（1934）给出了这一治疗过程的典范。

几乎在同时，对另一个话题的讨论也开始步入视点中心，即安全感。它可以被看做是历史和心理社会结构瓦解的对比物。并非巧合的是，在自恋和形而上学的年代(Lasch 1979; Bracher 1982)，安全感的话题最终占据了精神分析治疗技术讨论中的重要位置，尽管它的起源可以轻易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的Freud和Adler。Kohut的创新也许得益于病人和治疗师都对冲突心理学的分析本质不满，并开始寻找整体感和确定感——自恋性安全感。

## 当前观点

神经症发病率的流行病学调查直到近年才开始( Schepank 1987 ), 因此没有确切可以比较的过去资料。我们需要仰仗个人印象, 而个人印象因为诊断分类中强烈的流行元素而变得更加不可信。虽然如此, 但无可置疑的一点是, 如今的精神分析师面对的问题, 是Freud实践中从来没有关注过的(Thomä and Kächele 1976)。

大多数人生活在西方民主社会, 这样的社会系统屏蔽了他们可能受到的命运打击, 或者疾病带来的经济危机。现代, 西德精神分析师的常客大部分都不是纯粹自掏腰包的病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病人, 不论贫富, 现在都可以靠保险费用获得精神分析治疗, 而这又促使投保人规律的缴纳保金。Freud ( 1919a ) 的预言得到了证实。精神分析的疗效在今天比以前更重要。Eissler也确信, “社会化医疗将在未来[精神分析]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我们不期待社会为个体的分析需要支出大笔花销, 因为在大量病人中, 仅要求症状消退是可能的。” (Eissler, Miller 1975引用, p. 151 )。

我们采用这样的观点, 精神分析的科学基础和疗效之间有比一般认为的更紧密的关系。社会压力和竞争加剧, 使分析师加紧努力, 为他们的工作效果寻找科学依据。

## 1.8 汇聚和分歧

当我们20年前开始写这本教材的第一版时, 我们讨论的是精神分析各个学派之间的汇聚。来自行业内的重要评论都指向变革的必要。融合与整合多种信仰的不同趋势正在形成(M. Shane and E. Shane

1980)。我们相信，我们要讨论的可能性不单是各个精神分析学派之间的汇聚，也是精神分析和相邻学科之间的汇聚。本书（英文版）的一位美国评论家，R.D.Chessik在他的评论中（1988，p.884）就因为这一乐观的估计对我们加以指责，因此今天我们不希望忽略分歧。那时我们已经指出，现存的是无政府主义革命的状态。正如我们在前言中提到的，Wallerstein的报告“一种精神分析或者多种”终于在IPA承认多元化。但Fonagy（2003c）谈到碎片化，并说，“多元化”只是一个委婉的说法。Williams（2005）采取了更柔和的说法，他写道：

“我们带着精神分析的头脑，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多重概念系统从解释技术和经典范例发展中衍生而来。”（p.189）。也许是立场问题，该不该允许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它，或者个人有没有准备接受，承担多个概念创新这一科学难题的挑战。（Hanly 1990）。

### 扩展的客体关系理论

正如客体关系理论之于双人心理学和三人心理学必不可少，自我心理学如果没有“对话生活”，没有“他者”（Buber 1923）（又见Bohleber 2004, p.100ff.），恐怕也是闭门造车。在自我心理学导向中，治疗方法最开始非常系统，与人际冲突理论一一对应。A. Freud (1936)对防御机制重要性的强调就是一例。她在此表述的“精神分析疗法面面观”，定义了他们在内心冲突方面能达到的疆域（p.74f.）。与此同时，Hartmann (1939)的开创性贡献“自我心理学和适应问题”引发了社会科学与心理学的更多讨论，社会心理学在此承担了桥梁的作用。Fü rstenau (1964)和Carveth’ s (1984a)的批判性研究反而将缺乏真正学科

间合作的事实凸显的更明显。

客体关系理论发现，治疗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分析师成为了“新客体” (Loewald 1960)，因此在分析情境下，主体和主体间性得到了承认。这一趋势的特点是，移情概念的讨论更加深入广泛（见2.5节）。今天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到，精神分析方法一直是建立在双人的基础上的。从互动角度看，它揭露的正是客体关系的潜意识成分。毫无疑问，这解决了治疗实践和科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主体间性，即移情和反移情。基于Merton M. Gill，社会学对精神分析的理解是，这是唯一的主体间关系的实践模式。而在“双聚焦移情（Bifokalität der Übertragung）” (Thomä 1999)的基础上，分析师和病人互相影响。在此基础上考虑移情和反移情的定义，我们便可以将当前的流行理论分类。这样，我们既远离了极端主义的移情观点（Joseph 1985），也远离了主观夸大的反移情概念的绝对化(Thomä 2001a)。同时，我们也不应高估，精神分析的现代化也激起了“正教信徒”更多的反对 (Altmeyer and Thomä 2006)。其代表人物经常以Green和Bion对科学与众不同的理解来捍卫其论点。例如Weiß (1999)引用Bion (1962, 1963)的说法，强调精神分析研究狭义上说，就是对出现在分析情境中的情感体验进行反思。研究的任务是最终建立起分析师和被分析者之间的互动模型(Weiß 1999, p.895)。

治疗的目的，对病人来说重要的是认可治疗师的作用 (Thomä 1981b)。病人感受到治疗师的作用，不是抽象的过程，而是通过个人治疗的体验。这种对治疗师作用的认可，在Loewald看来与典型互动

相关，并且可以人为地将典型互动分离开来。一个人认同他人，被认同的人不是作为客体内射，也不是孤立的投映在内心。Loewald强调，个人认同不是来自客体内射，而是来自互动(Loewald 1980, p.48)。由此产生的新的经验，终止了重复的移情模式。治疗性改变发生在移情（重复）和冲击（新出现）的冲突中。实际上，精神分析对客体关系中的潜意识因素的描述，最重要的问题集中在行为方面，和他们在幻想（潜意识）世界中的反映。那些被保存为“内部客体”的，并不是孤立的东西，而是行为情境中的定制的记忆图像。Kris (1947)将行为研究表述为适合精神分析的科学导向，而在他之后 Schafer (1976) 发展出自己的行为语言也就合乎情理了。客体投射从出生就开始，储存在行为的质性可变情境中，对家庭和非家庭情境的研究更加丰富了这一理论（Akhtar 2005）。重复的沟通行为提升了无意识图式，并可能达到一个相当稳定的水平。这样持久的结构与移情的准备状态密切相关，处在准备状态时，就相当容易且迅速的激发移情。

这些过程是经典移情概念的核心，对此已经有大量经验性证据（Luborsky和Crits-Christoph 1998）。当然，Dreher（1999）是对的，这样成功的唯实践论并未涵盖所有临床实践的宝贵经验。但这已经足够满足治疗疗法研究者的一个愿望：关注解释的精确性（Crits-Christoph 等1998）。是否已经到了要放弃移情概念，以便我们可以更谦虚的探讨Schachter (2002) 建议改有的“惯性关系模式”，这个问题我们在此不作回答。

精神分析方法总是以二元关系为基础。更准确的说，客体关系中



的潜意识因素只有在分析师以互动为导向时才可获得。所有线索都指向一个结论，我们已经有可能解决主体间性——移情和反移情这样一个重大的治疗、理论课题了。

## 母子关系

精神分析客体关系理论在最开始就提到了互动情境。最近些年，密切关注互动情境的突出原因，也是在母子互动行为的发现。Bowlby (1969)对依恋的研究丰富了客体关系理论。Emde (1981)强调社会性互动的重要性，他的研究结果概要如下：

人类婴儿从一开始就受到社会性互动的影响，参与于照顾者的相互交流。我们无法想象，个体身处一个充满静态“驱力目标”的社会。而且，从这个角度，如“客体关系”这样的名词也不幸弄错了本意(p. 218)

甚至婴儿也能主动地建构他的体验。情感在这些互动过程中起了突出作用 (Emde 2005)。

力比多理论不再包含情感交流的过程。Spitz (1976)说明了Freud认为力比多客体主要来自儿童（和他的潜意识愿望）的立场，而这一观点与母子之间互动关系的背景并不冲突。这一传统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Kohut认为，婴儿以假设的自恋方式来看待和感受事物，并据此发展出了自体客体。

Harlow (1958, 1962)的前瞻性试验从这一观点来看非常有益。他用电线和厚绒布做成的替代母亲，即，用无生命的客体来喂养恒河猴，这些猴子不能玩耍，也无法建立社会关系。他们承受着无法控制的焦虑，突然爆发的愤怒，敌意和毁灭性。成年动物未显示出性行为。

Spitz将这些严重的发展缺陷归结于替代母亲和猴子婴儿之间缺乏互动。他相信，互动是母婴对话的基础。尽管他仍然固守着客体关系的概念(Spitz 1965, pp. 173, 182)，但毫无疑问，他的结论是基于主体间的交互系统。Emde (1981)作为Spitz在Denver的继任者，早年批评过广泛流传的错误概念，如婴儿是被动的，单纯的小生命，驱力引起的紧张状态和消失调控着他的行为。关于婴儿对待刺激反应被动，他首先考虑的是满足自身需求，这样的神话已经站不住脚了。

从长期来看，婴儿发展的新理论，以及沟通和行为理论的跨学科整合，将会给精神分析带来重要成果（Lichtenberg 1983）。在任何领域，对人类行为的潜意识维度的研究，精神分析都功不可没。

对超心理学和力比多理论的批评，为内心结构和人际冲突理论相关联铺平了道路。然而，人际关系导向无法被局限于“参与性观察”（Sullivan 1953）。这个名词非常准确，但却不够清楚，未说明分析师的参与意味着干预从见面伊始就开始了（见2.3节）。分析师无论安静倾听还是给予解释，都影响了他观察者的角色。他无法挣脱的事实是，就算他故意不给自己设立任何目标，他也参与了改变的每一个细节。

一个美国精神分析学会成员组成的讨论小组，以Lichtenberg为主席，在1977到1980年间多次会面。他们达成共识：“我们越避免把价值观作为我们审查的直接客体，它们就越不容易被觉察到，同时在潜意识里影响我们的技术和理论”（Lytton 1983, p.576）。如Devereux（1967）指出的那样，因为实践和研究的原因，当今分析师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需要承认，他不仅是一个观察者，也是被观察者。比如，

其他的分析师，或者相邻学科的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治疗师的情感，想法和做法，以及他们的想法和行为如何影响病人。这样由第三方深入分析情境的研究因为分析录音已经成为可能。关键的问题是，分析师对治疗过程的贡献。另外，在西德这些国家，治疗费用大部分由医疗保险支付，社会人士（以科学团体为代表）和投保人有权知道分析师是如何调整他们的治疗行为，当然必须尊重治疗双方的隐私，对此有明文规定。

在分析情境中的双人导向，如今已得到普遍认可，但它只是主体间性的全权委托。与之相反，正是因为分析师的能力是如此个人化，他必须为他选择的理论对他自身反移情的影响负责，不管治疗成功与否。因此越来越多本意实践的分析师成为了研究客体（Sandler 1983）。Madrid 1983年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会议就以此为主题：“‘工作’中的分析师”。

双人导向于新生儿医学研究的发现和对母婴互动的观察相呼应。Trevarthen (1977)提到“原始主体间性”。Spitz的学生，Emde和Robinson (1979)批判性的回顾了近300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揭露了旧式偏见，即那些广泛流传的错误概念，如婴儿是被动的，单纯的小生命，驱力引起的紧张状态和消失调控着他的行为。关于婴儿对待刺激反应被动，他首先考虑的是满足自身需求，这样的神话已经站不住脚了。

### 神话的终结

Emde和Robinson这种从以往研究中寻找答案的趋势依然继续着。据Sander (1980) 和Peterfreund (1980)的发现，最近的研究成果

如此重要, 导致了三个神话的终结: 成人化( 婴儿是跟我一样的个体 ), 理论化 ( 婴儿就是我的理论建构的那样 ), 病态化 ( 婴儿的感受和想法就像我的精神病人一样 )。因为Freud曾经将本能理论称为“我的神话” ( 1933 a, p. 95 ), 而神话又包含了对人类的深刻见解, 去神化的过程对分析师来说是需要谨慎思考的过程。精神分析的本能理论保留了大量神话, 不仅是因为这些比喻, 例如稳定化原理的内涵意义, 而是它将人类希望永存的愿望和爱与死亡的神秘与躯体假设联系起来, 凭此伪装成包罗万象的心理生理学解释。

我们不准备在这里花篇幅说明, 治疗情境下的主体间性是从母婴互动中发展起来的。我们最初关注的是理论的汇聚点, 它表明了分析情境的双人观对应人类本性, 就像从生命起始的一刹那我们就可以观察到的那样。我们赞同Wolff ( 1971 ) 的观点, 他是一位极其严谨的分析师和研究者。他曾提醒他的同事们说, 他们最重要的实践和研究课题既不能通过观察婴儿来解决, 也不能通过动物行为学, 神经生理学或分子生物学的帮助解决。另一方面, 分析师在用解释技术的规则来解读病人陈述中的潜意识意义时, 也不能忽略背后的发展理论。

不管治疗分析师有没有考虑到Piaget的客体稳定性发展理论, 它都在治疗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早期母婴关系的概念形成了他解释的基础。当然不同理论之间因为关注对象的复杂性和方法的不同, 肯定有不一致的地方。因此不同方法得到的相同结果, 或者难以置信的假设, 比如婴儿自闭症被证实,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另一方面。已经有大量研究开始关注母亲和孩子的真实分离, 这使互动的交互性处在应激状

态 ( Stern等, 1977 )。基于经验观察的基础, Papousek 和 Papousek (1983) 、 Papousek et al. (1984)假设, 婴儿是自主的, 且具备整合能力。

分离和原始主体间性是新生儿医学研究和最近对治疗二联体研究中最大也最重要的基本问题。我们同意Milton Klein (1981)出生即分离的观点, 这意味着每个新生个体都是主动的, 创造性的建构他的世界, 并渴望刺激。Brazelton和Als (1979)声称, 他们在刚出生的婴儿身上就观察到了情感和认知反应的迹象。

然而精确的时间点并不重要。显而易见, 儿童能主动地“建构”他的世界这一说法, 无法帮助我们了解他是怎样“体验”这个世界的。Piaget ( 1954 ) 的理论也假设母子之间的主体间性是由孩子的自我中心决定的, 因此支持了精神分析的假设, 不管妈妈顺应还是拒绝, 孩子都会把妈妈的行为体验为是他造成的这一切而哭泣。至于这种自我中心性是否与成人中自恋性的全能感类似, 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先天生物学模式调控着母亲和还是之间的互动, Emde (1981)的这一观点非常重要。另一方面, 先天生物学模式的特征形成了个性: 双联体中每个婴儿和每个母亲都是独特的。他们都可以以各自的方法准确识别物种特性 ( 人类 ) 的机制, 比如基础生物学模式, 而不会出错。Mahler用“同感性共情 ( coenesthetic empathy )”的概念 ( 1971, p.404 ), 来说明研究者通过观察母婴之间互动所产生的对深层感觉和知觉的共同感受和分享。相应的, 在治疗中保持好亲密和分离, 保持好形成“我们”的连结感和形成自我之间的平衡也很重要。

过去十年中, 关于母子之间情感交流的研究证实了Winnicott的观

点：“婴儿和母亲照顾共同形成了一个单元……我曾经说：‘对婴儿来说没有这回事’”（1965，p.39）。Winnicott又说，他本来的意思是，母亲照顾对婴儿来说无疑是重要的，没有它孩子就无法生存。因此他远离了Freud对原始自恋和从快乐原则过渡到现实原则的假设。他也指出，Freud自己就曾在他的论证中举出反例：

有理由反对，如果一个有机体成为快乐原则的奴隶，而忽视外部世界的现实，他根本无法让自己生存哪怕很短一段时间，因此这样的事情根本不会发生在现实中。然而虚构的作用也是如此，它调整了我们在考虑婴儿时的想法——如果只是讨论接受到的母亲照顾，那么婴儿就可以意识到这样的心理系统（1911 b, p. 220，补充强调）。

如果母亲照顾包含其中，虚构就不成立，而Winnicott的母子单元概念就有了用武之地。当然，无可置疑的是，母亲和孩子是不同的，就算婴儿还不能将自己表述为一个独立个体。Hartmann（1939）的自我自主性扎根于生物学，在母婴单元中，它意味着自我感知是通过与感受器官与特殊的他者感知进行交换而有选择发生的。因此，每个婴儿感知到的母亲都是不一样的，原因有二：第一，没有母亲对待孩子的方法是完全一样的。第二，每个孩子都有从母婴单元中发展出的个人化的应对方式。否则Winnicott（1965）在论述“真自体”和“假自体”时，就不可能着力强调母婴单元的概念。“真自体”指的是能认识到自身潜力，将自身从来自外界和假自体的表现的限制中解脱出来

的基础情感。

对母子互动的经验研究可以作为分水岭，它打开了最近几十年治疗技术理论的视野，终结了保守的结构主义理论家和客体关系理论家之间的争论。每个病人都是独特的，甚至Balint（1952）的双人心理学也无法忽视这一事实。两个相互依存又各自独立的人组成的治疗双联体，其任务是设法使病人得到最大程度的自主性。

因此，我们对双人心理学的定位就要修正。单人心理学建立在自然科学模型的基础上，它既不适合精神分析的理论，也不适合精神分析疗法。我们同意Balint对精神分析技术和精神分析发展心理学理论的批判，因为这些理论过于强调内心过程。无论如何，分析师有责任建立起最适合病人自我改变的环境，而如果病人并无改变的愿望，也不应该强迫。除了这样的批评，单人心理学中关于分析师的责任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理想的启发来自于个体，甚至自我认知，包括对人格潜意识成分的觉察，也与双人心理学有关。

根据新生儿研究结果重新调整精神分析的婴儿模式对治疗技术有着重要意义(Lebovici 和 Soule 1970)。每个分析师的解释，尤其是他对病人童年时代的重建，都是以他的发展理论为基础的。正因为此，我们采用了模型的理论概念表述：精神分析性婴儿，关于它有大量程度不同的描述。这一模型重建将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这些描述出自那些元老级人物，如Freud, Abraham, Klein, Ferenczi, A. and M. Balint, Winnicott, Mahler, 和Kohut。每个人都知道不同的精神分析婴儿各不相同。这些模型的设计者们必须接受他们的

模型与其他加以比较。

Kohut的悲剧人物是一个躺在摇篮里的婴儿，被只能部分反映他内在自恋的环境（即所谓的自体客体）围绕。Freud的自恋理论就像教父一样，让这个悲剧更加无可避免，但尽管如此，他还是相对较好的：魔鬼不是原始驱力，俄狄浦斯的内疚感也可以避免，依照Kohut所说，如果自恋性的自体通过爱的镜像自我觉察，早期悲剧就可以得到限制（Kohut 1984, p. 13）。在Kohut的理论，Freud的内疚感影响下，俄狄浦斯的自我和他的内心冲突成为童年时代自恋干扰的产物。如果没有干扰，3-5岁孩子的俄狄浦斯冲突期就会是良好的过渡阶段，健康的自体已经发展出来，因此也不会有内疚感。Kohut的力量给出了一个没有俄狄浦斯冲突的前景。从Kohut晚期的工作中也可以推断出，自体客体的良好共情也可将个人悲剧限制在合适的范围内。

Klein (1948, 1957)的精神分析性婴儿却大不一样。这次教父变成了Freud的死亡本能，确保了早期表现的恶性特征。它只能通过将世界分裂为好的乳房和坏的乳房来缓解。这个婴儿之后的悲剧，比起Kohut的缓和型，就更加意义深远。这样的说法听起来颇有自嘲的意味。Klein的成人出生时就像西西弗，他的所有尝试都因为恨和嫉妒的原罪而遭受了永恒的失败。整个一生所有投射和内射认同的过程和内容都保留了与家庭成员，团体，或整个人类的人际互动过程为基本载体。

为了突出描述这两大流行模型的精神分析婴儿的重要特征，我们要强调他们之间的不同和矛盾。这也是我们的意图。我们当前的考虑



不是提倡折中的实务主义，或者推荐从所有精神分析对儿童的早期理论中提取出最受赞赏的部分，将他们与一般发展心理学或者Piaget的部分理论混合起来，而是，我们相信卓有成效的折中主义只有在我们也关注来自不同领域被忽略的那些方面时，才会在精神分析和新生医学对互动的研究中发生。毕竟，让人不安的是，相同移情性内省方法——Kohut强调他在这方面与Klein的近似——应该导致更多对早期童年时期不同的理论重建。

当然，另一个可能是，理论重建的矛盾来自对不同疾病的治疗。然而，现有的文献未能支持这一假设，巧合的是，那些典型的精神分析婴儿的理论家父母也极少讨论这个问题。迟早，理论化的创造会使单一模型能从深层次上解释所有精神困扰：基于失败的镜像化上的自体缺陷，和产生于先天破坏欲，被看做罪恶之源的分裂-偏执和抑郁状态。

本能神话给来自不同精神分析家庭的婴儿以不同的特征：自恋（Kohut）或破坏性（Klein）。这是我们为什么分别说明自恋理论和死亡本能假设的原因。然而，如果将这些驱力的神话基础去除，精神分析性婴儿并没有失去活力和发展后劲。与Freud (1923a, p.255)相同，我们在此引述席勒《世界的智慧Die Weltweisen》中的诗句：“直到哲学将世界统一，饥饿与死亡统治着自然。”

## References to chap 1 volume 1

- Adorno TW (1952) Zum Verhältnis von Psychoanalyse und Gesellschaftstheorie. *Psyche - Z Psychoanal* 6: 1-18
- Akhtar S (2005) Early relationships and their internalization. In: Person ES, Cooper AM, Gabbard GO (Eds) *Textbook of psychoanalysis*.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Washington DC, London, pp 39–55
- Altmeyer M (2004) Inklusion, Wissenschaftsorientierung, Intersubjektivität. Modernisierungstendenzen im psychoanalytischen Gegenwartsdiskurs. Gedanken anlässlich einer amerikanischen Tagungsreise. *Psyche – Z Psychoanal* 58: 1111–1125
- Altmeyer M, Thomä H (2006) Einführung: Psychoanalyse und Intersubjektivität. In: Altmeyer M, Thomä H (Eds) *Die vernetzte Seele. Die intersubjektive Wende in der Psychoanalyse*. Klett-Cotta, Stuttgart, S 7-31
- Apel KO (1955) Das Verstehen. *Arch Begriffsgesch* 1:142—199
- Arlow JA (1979) Metaphor and the psychoanalytic situation. *Psychoanal Quart* 48: 363-385
- Arlow JA (1982) Psychoanalytic education. A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 *Annu Psychoanal* 10: 5-20
- Balint M (1935) Zur Kritik der Lehre von den prägenitalen Libidoorganisationen. *Int Z Psychoanal* 21: 525–543
- Balint M (1948) On the psychoanalytic training system. *Int J Psychoanal* 29: 163–173
- Balint M (1952) *Primary love and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 Hogarth, London
- Balint M (1968) *The basic fault. Therapeutic aspects of regression*. Tavistock, London
- Bateman AW, Fonagy P (2004) *Psychotherapy for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Mentalisation-based trea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Baumann U (Ed) (1981) *Indikation zur Psychotherapie. Perspektiven für Forschung und Praxis (Fortschritte der klinischen Psychologie, vol 25)*. Urban & Schwarzenberg, Munich
- Beckermann A (1977) Handeln und Handlungserklärungen. In: Beckermann A (Ed) *Analytische Handlungstheorie*. Suhrkamp, Frankfurt am Main, pp 7-84
- Beigler JS (1975) A commentary on Freud's treatment of the rat man. *Annu Psychoanal* 3: 27 1—285
- Bernfeld S, Feitelberg S (1929) Das Prinzip von Le Chatelier und der Selbsterhaltungstrieb. *Imago* 15:289—298
- Bernfeld S, Feitelberg S (1930) Über psychische Energie, Libido und deren Meßbarkeit. *Imago* 16:66—118
- Bettelheim B (1982) *Freud and man's soul*. Knopf, New York.
- Bibring E (1937) Versuch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 der Heilung. *Int Z Psychoanal* 23:18—42
- Binswanger L (1955[1920]) *Psychoanalyse und klinische Psychiatrie*. In: Binswanger L (Ed)

- Ausgewählte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vol 11: Zur Problematik der psychiatrischen Forschung und zum Problem der Psychiatrie. Francke, Bern, pp 40—66
- Birbaumer N (2004) Hirnforscher als Psychoanalytiker. In: Geyer C (Ed) Hirnforschung und Willensfreiheit. Suhrkamp, Frankfurt, S 27-29
- Blarer A von, Brogle I (1983) Der Weg ist das Ziel. Zur Theorie und Metatheorie der psychoanalytischen Technik. In: Hoffmann SO (Ed) Deutung und Beziehung. Kritische Beiträge zur Behandlungskonzeption und Technik in der Psychoanalyse. Fischer, Frankfurt am Main, pp 71—85
- Blos P (1985) Son and father. Before and beyond the Oedipus complex. Free Press, New York, London
- Blum H (1999) Discussion of Fonagy's "Memory and therapeutic action". Int J Psychoanal 80: 254
- Bohleber W (1992) Identität und Selbst. Die Bedeutung der neueren Entwicklungsforschung für die psychoanalytische Theorie des Selbst. Psyche - Z Psychoanal 46: 336–365
- Bowlby J (1969)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I: Attachment. Basic Books, New York.
- Bowlby J (1973)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2: Separation. Anxiety and anger. New York, Basic Books.
- Bowlby J (ed) (1980)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3: Loss, sadness and depression. London, Hogarth Press.
- Brandl Y, Bruns G, Gerlach A, Hau S, Janssen P, Kächele H, Leichsenring F, Leuzinger-Bohleber M, Mertens W, Rudolf G, Schlösser A-M, Springer A, Stühr U, Windaus E (2004) Psychoanalytische Therapie. Eine Stellungnahme für die wissenschaftliche Öffentlichkeit und für den Wissenschaftlichen Beirat Psychotherapie. Forum Psychoanal 20: 13-125
- Brandt LW (1961) Some notes on English Freudian terminology. J Am Psychoanal Assoc 9: 331–339
- Brandt LW (1972) Mindless psychoanalysis. Contemp Psychol 17: 189–191
- Brandt LW (1977) Psychoanalyse versus psychoanalysis: traduttore, traditore. Bedeutungsunterschiede zwischen psychoanalytischen Grundbegriffen im Englischen und im Deutschen. Psyche – Z Psychoanal 31: 1045–1051
- Brazelton TB, Cramer B (1991) Die frühe Bindung. Klett, Stuttgart
- Brenner C (1976)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 and psychic conflic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Brenner C (1979b) The components of psychic conflict and its consequences in mental life. Psychoanal Q 48:547—567
- Brenner C (1980) Metapsychology and psychoanalytic theory. Psychoanal Q 49:189 214
- Brenner C (1995) Some remarks on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 J Clin Psychoanalysis 4: 413-428
- Brenner C (2002) Book Review: The Hartmann Era, Edition M. S. Bergmann. J Am Psychoanal Ass 50: 335-336
- Breuer J, Freud S (1936) Studies in hysteria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monograph series no 61).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Publishing Co, New York
- Buber M (1974 [1923]) Ich und Du, 8. Aufl. Schneider, Heidelberg

- Bubner R (1976) *Handlung, Sprache und Vernunft*. Suhrkamp, Frankfurt am Main
- Buchheim A, Kächele H (2006) Klinische Bindungsforschung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die Psychosomatik. In: Stöbel-Richter Y, Ludwig A, Franke P, Neises M, Lehmann A (Eds) *Anspruch und Wirklichkeit in der Psychosomatischen Frauenheilkunde*. Beiträge der Jahrestagung 2005 der DGPF. Psychosozial-Verlag, Giessen, S 65-87
- Buchholz M (2000) Die Zukunft der Psychoanalyse der Zukunft. In: Schlösser A-M, Höhfeld K (Eds) *Psychoanalyse als Beruf*. Psychosozial-Verlag, Giessen pp 47–72
- Carveth DL (1984a) Psychoanalysis and social theory. The Hobbesian problem revisited. *Psychoanal Contemp Thought* 7: 43–98
- Carveth DL (1984b) The analyst's metaphors. A deconstructionist perspective. *Psychoanal Contemp Thought* 7: 491–560
- Cavell M (1993) *The psychoanalytic mind. From Freud to philosoph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 Cheshire NM (1975) *The nature of psychodynamic interpretation*. Wiley, London New York Sidney Toronto
- Cheshire NM, Thomä H (Eds) (1987) *Self, symptoms and psychotherapy*. Wiley, New York
- Clarkin JF, Kernberg OF, Yeomans FE (1999) *Transference-Focused Psychotherapy for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Patients*. Guilford Press, New York
- Collingwood RG (1946)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 Cooper AM (1984b) Columbia Center celebrates 40th anniversary. *Am Psychoanal Assoc Newsletter* 18 (4):10—15
- Cooper AM (2001) Psychoanalytischer Pluralismus. Fortschritt oder Chaos. In W. Bohleber and S. Drews (Hrsg) *Die Gegenwart der Psychoanalyse und die Psychoanalyse der Gegenwart*. Klett-Cotta, Stuttgart, pp 58–77
- Cox M, Theilgaard A (1987) *Mutative metaphors in psychotherapy. The Aeolian mode*. Tavistock Publication, London
- Cremerius J (1979) Gibt es zwei psychoanalytische Techniken? *Psyche* 33:577—599
- Cremerius J (1981) Freud bei der Arbeit über die Schulter geschaut. Seine Technik im Spiegel von Schülern und Patienten. In: Ehebald U, Eickhoff FW (Eds) *Humanität und Technik in der Psychoanalyse*. Jahrb Psychoanal, Beiheft 6. Huber, Bern Stuttgart Vienna. pp. 121-158
- Crits-Christoph P, Cooper A, Luborsky L (1998) The measurement of accuracy of interpretations. In: Luborsky L, Crits-Christoph P (eds) *Understanding Transference*, 2nd edn. Basic Books, New York, pp 197–212
- Davidson D (2001) *Subjective, intersubjective, objek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Devereux G (1967) *From anxiety to method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Mouton, Den Haag Paris
- Dilman I (1984) *Freud and the mind*. Blackwell, Oxford
- Dreher AU (1999) Was sollte man bedenken, wenn man Übertragung messen will? *Zsch psychoanal Theorie Praxis* 14: 260–283
- Eagle M (1973) Sherwood on the logic of explanation in psychoanalysis. In: Rubinstein BB (Hrsg) *Psychoanalysis and contemporary scienc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New York, S 331-337

- Edelson JT (1983) Freud's use of metaphor. *Psychoanal Study Child* 38:17—59
- Eisold K (2003) Toward a psychoanalytic politics. *J Am Psychoanal Ass* 51 (Suppl): 301–323
- Eissler KR (ed) (1949) Searchlights on delinquency. New psychoanalytic studies dedicated to Professor August Aichhorn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July 27, 1948.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Eissler KR (1950) The Chicago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ixth period of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 *J Gen Psychol* 42:103—157
- Eissler KR (1953) The effect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ego on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 *J Am Psychoanal Assoc* 1:104—143
- Eissler KR (1958) Remarks on some variations in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 *Int J Psychoanal* 39: 222 229
- Eissler KR (1965) Medical orthodoxy and the future of psychoanalysi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Emde RN (1981) Changing models of infancy and the nature of early development. Remodeling the foundation. *J Am Psychoanal Assoc* 29: 179–219
- Emde RN (2005) A developmental orientation for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In: Person ES, Cooper AM, Gabbard GO (Eds) *Textbook of psychoanalysis*.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Washington DC, London, pp 117–130
- Erikson EH (1959) 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 Selected papers (Psychological issues, vol 1, no 1, monograph 1).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Farrell BA (1981) The standing of psychoanaly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Feigl H (1957) The "Mental" and the "Physical". In: Feigl H, Scriven M, Grover M (Eds) *Minnesota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pp 370–497
- Ferenczi S, Rank O (1924) *Entwicklungsziele der Psychoanalyse*. Internationaler Psychoanalytischer Verlag, Vienna
- Ferguson M (1981) Progress and theory change. The two analyses of Mr. Z. *Annu Psychoanal* 9:133–160
- Feyerabend P (1983) *Wider den Methodenzwang*. Suhrkamp, Frankfurt a. M.
- Fonagy P (1999) Memory and therapeutic action. *Int J Psychoanal* 80: 215–223
- Fonagy P (2001) *Attachment theory and psychoanalysis*. Other Press, New York
- Fonagy P (2003b) Some complexities in the relationship of psychoanalytic theory to technique. *Psychoanal Q* 72: 13–48
- Fonagy P, Allison L, Clarkin J, Jones E, Kächele H, Krause R, Lopez D, Perron R (Eds) (2002) *On open door review of the outcome of psychoanalysis*. 2nd edn. Research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http://www.ipa.org.uk>, London
- Fonagy P, Target M, Allison L (2003) Gedächtnis und therapeutische Wirkung. *Psyche - Zeitschrift für Psychoanalyse* 57: 841–856
- Frank A (1979) Two theories or one? Or none? *J Am Psychoanal Assoc* 27:169—207

- Freud A (1937) The ego and the mechanisms of defence. Hogarth, London
- Freud A (1971) The ideal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 A utopia. In: Freud A (ed) The writings of Anna Freud, vol VII, pp 73—93.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Freud A (1972a) Child analysis as a sub-speciality of psychoanalysis. *Int J Psychoanal* 53:151–156
- Freud A (1983) Some observations. In: Joseph ED, Widlöcher D (eds) The identity of the psychoanalyst (Int Psychoanal Assoc, monograph series no 2).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pp 257—263
- Freud S (1900a)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SE vol VI/V, pp 1-625
- Freud S (1909b) Analysis of a phobia in a five-year-old boy. SE vol X, pp I—149
- Freud S (1910d) The future prospects of psycho-analytic therapy. SE vol XI, pp 139—151
- Freud S (1910k) 'Wild' psycho-analysis. SE vol XI, pp 219—227
- Freud S (1911 b) Formulations on the two principles of mental functioning. SE vol XII, pp 213-226
- Freud S (1914d) O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SE vol XIV, pp 1—66
- Freud S (1915c) Instincts and their vicissitudes. SE vol XIV, pp 109—140
- Freud S (1915e) The unconscious. SE vol XIV, pp 159—215
- Freud S (1916/17)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SE vol XV/XVI
- Freud S (1917d) A metapsychological supplement to the theory of dreams. SE vol XIV, pp 217-235
- Freud S (1918b) From the history of an infantile neurosis. SE vol XVII, pp I—122
- Freud S (1919a) Lines of advance in psycho-analytic therapy. SE vol XVII, pp 157–168
- Freud S (1919e) 'A child is being beaten'. SE vol XVII, pp 175—204
- Freud S (1920g)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SE vol XVIII, pp I—64
- Freud S (1921c)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SE vol XVIII, pp 65—143
- Freud S (1923a) Two encyclopaedia articles. SE vol XVIII, pp 233—259
- Freud S (1923b) The ego and the id. SE vol XIX, pp I—66
- Freud S (1925d) An autobiographical study. SE vol XX, pp 1—74
- Freud S (1926f) Psycho-analysis. SE vol XX, pp 259—270
- Freud S (1927a) Postscript to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SE vol XX, pp 251—258
- Freud S (1931d) The expert opinion of the Halsmann case. SE vol XXI, pp 251—253
- Freud S (1933a)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SE vol XXII, pp 1—182
- Freud S (1937c) Analysis terminable and interminable. SE vol XXII, pp 209—253
- Freud S (1940a) An 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 SE vol XXIII, pp 139—207

- Freud S (1950a) 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 SE vol 1, pp 281 397
- Friedman L (1978) Trends in the 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treatment. *Psychoanal Q* 47:524—567
- Fürstenau P (1964) Ich-Psychologie und Anpassungsproblem. Ein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Heinz Hartmann. *Jahrb Psychoanal* 3: 30–55
- Gabbard GO (2001) What can neuroscience teach us about transference?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9: 1-18
- Gabbard GO (2005) Joseph Sandler's contribution to the concept of countertransference. *Psychoanal Inq* 25: 184–195
- Gadamer HG (1965) *Wahrheit und Methode. Anwendungen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 Mohr Tübingen; engl. (1989) *Truth and Method*. 2nd rev. edition. Trans. J. Weinsheimer and D.G.Marshall. Crossroad, New York
- Gill MM (1976) Metapsychology is not psychology. In: Gill MM, Holzman PS (eds) *Psychology versus metapsychology. Psychoanalytic essays in memory of George S. Klein (Psychological issues, vol 9, no 4, monograph 36)*. Basic Books, New York, pp 71—105
- Gill MM (1977) Psychic energy reconsidered. Discussion. *J Am Psychoanal Assoc* 25:581—597
- Gill MM, Holzman PS (eds) (1976) *Psychology versus metapsychology. Psychoanalytic essays in memory of George S. Klein (Psychological issues, vol 9, no 4, monograph 36)*.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Gill MM, Klein GS (1964) The structuring of drive and reality. David Rapaport's contribution to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logy. *Int J Psychoanal* 45:483 498
- Gitelson M (1964) On the identity crisis in American psychoanalysis. *J Am Psychoanal Assoc* 12:451—476
- Glover E (1955)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Bailliere Tindall & Cox, London
- Goldberg A (1981) One theory or more? *Contemp Psychoanal* 17:626—638
- Grant J, Sandell R (2004) Close family or mere neighbours? Some empirical data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therapy. In: Richardson P, Kächele H, Rendlund C eds) *Research on 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 with Adults*. Karnac, London, pp 81-108
- Grassi E (1979) *Die Macht der Phantasie. Zur Geschichte abendländischen Denkens*. Athenäum, Königstein/Ts
- Greenson RR (1960) Empathy and its vicissitudes. *Int J Psychoanal* 41:418—424
- Greenspan SI, Pollock GH (Eds) (1980) *The course of life. Psychoanalytic contributions toward understanding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Vol 1: Infancy and early childhood*.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Washington DC
- Greenspan SI, Pollock GH (eds) ( 1981 ) *The course of life. Psychoanalytic contribution toward understanding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Vol 2: Adulthood and aging process*.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Washington DC

- Grossman WL, Simon B (1969) Anthropomorphism. Motive, meaning, and causality in psychoanalytic theory. *Psychoanal Study Child* 24: 78-111
- Grünbaum A (1984) The foundations of psychoanalysis.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 Grünbaum, A. (1988). Die Grundlagen der Psychoanalyse (The foundations of psychoanalysis). Stuttgart: Reclam.
- Grünbaum A (1993) Validation in the clinical theory of psychoanalysis. A study in the philosophy of psychoanalysi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New York
- Habermas J (1971)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Beacon Press, Boston
- Habermas J (1985)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Beacon Press, Boston
- Häfner S, Franz M et al (2001a) Psychosoziale Risiko- und Schutzfaktoren für psychische Störungen: Stand der Forschung. Teil 1: Psychosoziale Risikofaktoren. *Psychotherapeut* 46: 343–347
- Häfner S, Franz M et al (2001b) Psychosoziale Risiko- und Schutzfaktoren für psychische Störungen: Stand der Forschung. Teil 2: Psychosoziale Schutzfaktoren. *Psychotherapeut* 46: 403–408
- Hanly C (1990) The concept of truth in psychoanalysis. *Int J Psychoanal* 71:375-383
- Harlow HF (1958) The nature of love. *Am Psychol* 13: 673–685
- Harlow HF (1962) The heterosexual affectional system in monkeys. *Am Psychol* 17: 1–9
- Hartmann H (1927) Die Grundlagen der Psychoanalyse. Thieme, Leipzig
- Hartmann H (1939) Ich-Psychologie und Anpassungsproblem. *Int Z Psychoanal* 24: 62–135; (1958) Ego psych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adaptio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Hartmann H (1950) Psychoanalysis an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Psychoanal Study Child* 5: 7–17.
- Hartmann H (1955) Notes on the theory of sublimation. *Psychoanal Study Child* 10:9 29
- Hartmann H, Kris E, Loewenstein RM (1949) Notes on the theory of aggression. *Psychoanal Study Child* 34: 9 36
- Hayman A (1969) What do we mean by "Id"? *J Am Psychoanal Assoc* 17:353—380
- Hermann I (1934) Die Psychoanalyse als Methode. Beihefte zur "Internationalen Zeitschrift für Psychoanalyse" und zur "Imago", No. 1. Internationaler Psychoanalytischer Verlag, Wien
- Hermanns LM (2001) 50 Jahre Deutsche Psychoanalytische Vereinigung. Zur Geschichte der Psychoanalyse in Deutschland 1950 –2000. In: Bohleber W Drews S (Eds) Die Gegenwart der Psychoanalyse- Die Psychoanalyse der Gegenwart. Klett, Stuttgart pp 35–57
- Hesse MB (1966) Models and analogies in science. University Press, Notre Dame
- Hoffer W (1950) Three psychological criteria for the termination of treatment. *Int J Psychoanal* 31: 194–195
- Hoffmann SO (1986) Die sogenannte frühe Störung. *Prax Psychosom Psychother* 31: 179–190
- Hoffmann S, Egle T (1996) Risikofaktoren und protektive Faktoren für die



- Neurosenentstehung. *Psychotherapeut* 41: 13-16.
- Holt RR (1992) The contemporary crisis of psychoanalysis. *Psychoanalysis & Contemporary Thought* 15: 375–403
- Holt RR (1967a) David Rapaport. A memoir. In: Holt RR (ed) *Motives and thought. Psychoanalytic essays in honor of David Rapaport* (Psychological issues, vol 5, no 2—3, monograph 18—19).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pp 7—17
- Holt RR (1976) Drive or wish?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motivation. In: Gill MM, Holzman PS (Eds) *Psychology versus metapsychology. Psychoanalytic essays in memory of George S. Klein*. Int Univ Press, New York, pp 158-197
- Holt RR (1981) The death and transfiguration of metapsychology. *Int Rev Psychoanal* 8: 129-143
- Holt RR (1982) The manifest and latent meaning of metapsychology, (Ed) @@@@@ Bd: 10.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Holzman PS (1976) The future of psychoanalysis and its institutes. *Psychoanal Q* 45: 250–273
- Home H (1966) The concept of mind. *Int J Psychoanal* 47:42—49
- Huber D, Klug G (2004) Contributions to the measurement of mode-specific effects in long-term psychoanalytic therapy. In: Richardson P, Kächele H, Renlund C (Eds) *Research on 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 with adults*. Karnac, London, pp 63-80
- Jacobson E (1964) *The self and the object world*.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Jaspers K (1963) *General psychopath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 Jones E (1959) *Free associations*. Basic Books, New York
- Joseph B (1985) Transference: the total situation. *Int J Psychoanal* 66: 447–454
- Joseph ED, Widlöcher D (Eds) (1983) *The identity of the psychoanalyst* (Int Psychoanal Assoc, monograph series no 2).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Kächele H (1994) Book Review: "Inter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Psychoanalysis or Psychotherapy?" By Jerome Oremland, with a critical evaluation by Merton M. Gill. Hillsdale, NJ: Analytic Press, 1991. *J Am Psychoanal Ass* 42: 919-925
- Kächele H (2009) A Hungarian precursor of attachment theory: Ferenczi's successor, Imre Hermann. *American Imago*
- Kächele H (2010a)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therapy. *Int J Psychoanal* 91: 35-43
- Kächele H (2010b) Klinische Überzeugung und empirische Belege. In: Münch K, Munz D, Springer A (Eds) *Die Psychoanalyse im Pluralismus der Wissenschaften*. Psychosozial-Verlag, Giessen, pp 13-32
- Kächele H, Schachter J, Thomä H (Eds) (2009) *From Psychoanalytic Narrative to Empirical Single Case Research. Implications for Psychoanalytic Practice*. Routledge, New York
- Kächele H, Thomä H (2000) On the devaluation of the Eitingon-Freud model of psychoanalytic education. Letters to the editor. *Int J Psychoanal* 81: 806-808

- Kagan J (1982) Psych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human infant: An evaluative summary. W T Grant Foundation, New York
- Kaminski G (1970) Verhaltenstheorie und Verhaltensmodifikation. Entwurf einer integrativen Theorie psychologischer Praxis am Individuum. Klett, Stuttgart
- Kandel ER (1979) Psychotherapy and the single synapse. The impact of psychiatric thought on neurobiologic research. *N Engl J Med* 301: 1028-1037
- Kandel ER (1983) From metapsychology to molecular biology. Explorations into the nature of anxiety. *Am J Psychiatry* 140: 1277-1293
- Kandel (1998) A new intellectual framework for psychiatry. *Am J Psychiatry* 155: 457-469
- Kandel E (1999) Biology and the future of psychoanalysis: A new intellectual framework for psychiatry revisited. *Am J Psychiatry* 156: 505- 522
- Kanzer M, Glenn J (Eds) (1980) Freud and his patients. Aronson, New York
- Kellerman N (2001) Psychopathology in children of Holocaust survivors: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Isr J Psychiatry Relat Sci* 38: 36–46
- Kernberg OF (1972) Critique of the Kleinian school. In: Giovacchini PL (Ed) *Tactics and techniques in psychoanalytic therapy*. Hogarth, London, pp 62–93
- Kernberg OF (1982) To teach or not to teach psychotherapy techniques in psychoanalytic education. In: Joseph ED, Wallerstein RS (eds) *Psychotherapy. Impact on psychoanalytic training. The influence of practice and theory of psychotherapy on education in psychoanalysis* (Int Psychoanal Assoc, monograph series no 1)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New York, pp 1–37
- Kernberg OF (1984) Severe personality disorders. Psychotherapeutic strateg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London
- Kernberg OF (1985) Changes in the nature of psychoanalytic training, structure of training, and standards of training. In: Wallerstein RS (ed) *Changes in analysts and their training* (Int Psychoanal Assoc, monograph series no 4). Int Psychoanal Assoc, London, pp 56–61
- Kernberg OF (1986) Institutional problems of psychoanalytic education. *J Am Psychoanal Assoc* 34: 799–834.
- Kernberg OF (1996) Thirty methods to destroy the creativity of psychoanalytic candidates. *Int J Psychoanal* 77: 1031–1040.
- Kernberg OF (1999) Psychoanalysis, psychoanalytic therapy and supportive psychotherapy: Contemporary controversies. *Int J Psychoanal* 80: 1075–1091
- Kernberg OF (2000) A concerned critique of psychoanalytic education. *Int J Psychoanal* 81: 97–120
- Kernberg OF (2002a) Neue Entwicklungen der Behandlungstechnik in den englischsprachigen psychoanalytischen Schulen. *Forum Psychoanal* 18: 1–19
- Kernberg OF (2000b) Merton Gills Beitrag zur Deutung der Übertragung. In: Schlösser A-M, Höfeld K (Hrsg) *Psychoanalyse als Beruf*. Psychosozial-Verlag, Giessen, S 311–328
- Kernberg OF (2005b) Coming changes in psychoanalytic education. Vortrag auf einem Panel der Am Psychoanal Assoc, Jan 2005, New York
- Kerz JP (1985) Das wiedergefundene "Es". Zu Bernd Nitzschkes Aufsatz über die Herkunft des "Es". *Psyche – Z Psychoanal* 85: 125–149
- Kestenberg J (1989) Neue Gedanken zur Transposition. Klinische, therapeutische und entwicklungsbedingte Betrachtungen. *Jahrb Psychoanal* 24: 163–189
- Klauber J (1968) On the dual use of historical and scientific method in psychoanalysis. *Int J Psychoanal* 49:80—88

- Klein GS (1969) Freud's two theories of sexuality. In: Breger L (Hrsg) Clinical-cognitive psychology. Models and integrations.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 S 136-181
- Klein GS (1970) Two theories or one? *Bull Menn Clin* 37:102—132
- Klein GS (1973) Is psychoanalysis relevant? *Psychoanal Contemp Sci* 2: 3-21
- Klein GS (1976) *Psychoanalytic theory. An exploration of essential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Klein M (1935) 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manic-depressive states. *Int J Psychoanal* 16: 145–174.
- Klein M (1945) The Oedipus complex in the light of early anxieties. *Int J Psychoanal* 26: 11–33
- Klein M (1946) 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 *Int J Psychoanal* 27: 99–110
- Klein M (1948) *Contributions to psycho-analysis, 1921–1945.* Hogarth, London
- Kohut H (1959) Introspection, empathy, and psychoanalysis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 of observation and theory. *J Am Psychoanal Assoc* 7:459-483
- Kohut H (1971) *The analysis of the self.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the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 of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Kohut H (1984) *How does analysis cur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London
- Kris E (1947) The nature of psychoanalytic propositions and their validation. In: Newman LM (ed) *Selected papers of Ernst Kris.*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CT, 1975 pp 3–23
- Kris E (1956a) On some vicissitudes of insight in psychoanalysis. *Int J Psychoanal* 37: 445–455
- Kris E (1975 [1947]) The nature of psychoanalytic propositions and their validation. In: Newman LM (Ed) *Selected papers of Ernst Kris.*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pp 3-23
- Kubie LS (1947) The fallacious use of quantitative concepts in dynamic psychology. *Psychoanal Q* 16:507 518
- Kuhn T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 Kutter P (Ed) (1992) *Psychoanalysis International. A guide to psychoanalysis throughout the world. volume 1.* fromman-holzboog, Stuttgart
- Kutter P (Ed) (1995) *Psychoanalysis International. A guide to psychoanalysis throughout the world. volume 2.* fromman-holzboog, Stuttgart
- Lacan J (1968) *The language of the self. The function of language in psychoanalysis.* Johns Hopkins Press, Baltimore
- Lambert MJ (Ed) (2004) *Bergin and Garfield's handbook of psychotherapy and behavior change* 5th edn. Wiley, New York
- Langs RJ (1976) *The bipersonal field.* Aronson, New York
- Laplanche J, Pontalis JB (1973) *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lysis.* Hogarth, London
- Lasch C (1979) *Haven in a heartless world. The family besieged.* Basic Books, New York
- Laub D (2002) Testimonies in the treatment of genocidal trauma. *J Appl Psychoanal Stud* 4: 63–87

- Laufer M (1982) The cost of psychoanalytic training and the future psychoanalyst. *Int Psychoanal Assoc Newsletter* 14 (2):1
- Leichsenring F, Rabung S, Leibing E (2004) The efficacy of short-term psychodynamic psychotherapy in specific psychiatric disorders. A meta-analysis. *Arch Gen Psychiatry* 61: 1208-1216
- Leichsenring F, Biskup J, Kreische R, Staats H (2005) The Göttingen Study of psychoanalytic therapy. *Int J Psychoanal* 86: 433–455
- Leuzinger-Bohleber M, Stuhr U, Rüger B, Beutel M (2003) How to study the quality of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s and their long term effects on patients well-being. A representative multiperspective follow-up study. *Int J Psychoanal* 84: 263-290
- Leuzinger-Bohleber M, Roth G, Buchheim A (Eds) (2008) *Psychoanalyse, Neurobiologie, Trauma*. Schattauer, Stuttgart
- Lichtenberg J (1983a) The influence of values and value judgement on the psychoanalytic encounter. *Psychoanalytic Inquiry* 3: 647-664
- Lichtenberg J (1983b) *Psychoanalysis and infant research*. Analytic Press, Hillsdale
- Lidz T (1968) *The person. His development throughout the life cycle*. Basic Books, New York
- Loewald HW (1960) On the therapeutic action of psychoanalysis. *Int J Psychoanal* 41: 16–33
- Loewald HW (1980) *Papers on psychoanalysis*.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CT
- Loewenstein RM (1958) Remarks on some variations in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 *Int J Psychoanal* 39:202—210
- Lorenzer A (1974) *Die Wahrheit der psychoanalytischen Erkenntnis. Ein historisch-materialistischer Entwurf*. Suhrkamp, Frankfurt am Main
- Luborsky L, Crits-Christoph P (1998) *Understanding transference* 2nd edn. Basic Books, New York
- Luyten P, Blatt SJ, Houdenhove Bv, Corveleyn J (2006) Depression research and treatment: Are we going skating where the puck is going to be.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6: 985-999
- Lytton SM (1983) A brief historical survey on the influence of value judgements on psychoanalytic theory and practice. *Psychoanal Inquiry* 3:573—576
- Mahler MS (1971) A study of the separation – individuation process and its possible application to borderline phenomena in the psychoanalytic situation. *Psychoanal Study Child* 26: 403–424
- Meissner WW (1981) Metapsychology—who needs it? *J Am Psychoanal Assoc* 29:921-938
- Miller I (1975)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the future psychoanalysis. A view from within. *J Am Psychoanal Assoc* 23: 139–153
- Milrod BL, Busch FN, Cooper AM, Shapiro T (1997) *Manual of panic-focused psychodynamic psychotherapy*.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Washington
- Mitchell SA (1988) *Relational concepts in psychoanalysis. An integr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 Modell AH (1981) Does metapsychology still exist? *Int J Psychoanal* 63:391 402

- Modell AH (1984) *Psychoanalysis in a new contex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Moore MS (1980) The nature of psychoanalytic explanation. *Psychoanal Contemp Thought* 3: 459-543
- Moser U (1991) Vom Umgang mit Labyrinthen. *Praxis und Forschung in der Psychoanalyse - eine Bilanz. Psyche - Zeitschrift für Psychoanalyse* 45: 315-334
- Nietzsche F (1973) *Sämtliche Werke, Bd 1, Morgenröte*.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 Orlinsky DE, Rønnestad MH, Willutzki U (2004) Fifty years of psychotherapy process-outcome research: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Lambert MJ (Eds) *Handbook of Psychotherapy and Behavior Change*. Wiley, New York, pp 307-389
- Ornston D (1982) Strachey's influence. A preliminary report. *Int J Psychoanal* 63: 409-426
- Ornston D (1985a) Freud's conception is different from Strachey's. *J Am Psychoanal Assoc* 33: 379-412
- Ornston D (1985b) The invention of "cathexis" and Strachey's strategy. *Int Rev Psychoanal* 12: 391-412
- Panksepp J (1999) Emotions as viewed by psychoanalysis and neuroscience: An exercise in consilience. *Neuro-Psychoanalysis* 1: 15-38
- Pontalis JB (1965) *Apres Freud*. Julliard, Paris
- Parens H (1979) *The development of aggression in early childhood*. Aronson, New York
- Parin P, Parin-Matthey G (1983a) Medicozentrismus in der Psychoanalyse. Eine notwendige Revision der Neurosenlehre und ihre Relevanz für die Theorie der Behandlungstechnik. In Hoffmann SO (Ed) *Deutung und Beziehung. Kritische Beiträge zur Behandlungskonzeption und Technik in der Psychoanalyse*. Fischer, Frankfurt am Main, pp 86-106
- Parsons T (1964) *Social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 Free Press, London
- Paul RA (2005) Anthropology. In: Person ES, Cooper AM, Gabbard GO (eds) *Textbook of psychoanalysis*.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Washington DC, pp 479-489
- Person ES, Cooper AM, Gabbard GO (eds) (2005a) *Textbook of Psychoanalysis*.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Washington DC
- Person ES, Cooper AM, Gabbard GO (2005b) Introduction. In: Person ES, Cooper AM, Gabbard GO (Eds) *Textbook of Psychoanalysis*.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Washington DC, p I
- Piaget J (1954)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in the child*. Basic Books, New York
- Pine F (2005) Theories of motivation. In: Person ES, Cooper AM, Gabbard GO (eds) *Textbook of psychoanalysis*.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Washington DC, pp 3-19
- Pines M (1985) On the question of revision of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Freud's writing. *Int J Psychoanal* 66: 1-2
- Pollock, GH, Greenspan SI (Eds) (1998) *The course of life: Completing the journe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Madison
- Popper KR, Eccles JC (1977) *The self and its brain. An argument for interactionism*.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New York
- Pribram KH, Gill MM (1976) *Freud's project reassessed*. Hutchinson, London

- Radebold H (1994) Psychoanalytische Psychotherapie und Psychoanalyse mit älteren Menschen. *Z Psychoanal Theorie Praxis* 9: 247–259
- Radebold H (Ed) (1997) *Altern und Psychoanalyse*. Vandenhoeck & Ruprecht, Göttingen
- Rapaport D (1960) The structure of psychoanalytic theory. A systematizing attempt (Psychological issues, vol 2, no 2, monograph 6).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Rapaport D, Gill MM (1959) The points of view and assumptions of metapsychology. *Int J Psychoanal* 40 :153—162
- Reiche R (1991) Haben frühe Störungen zugenommen. *Psyche – Z Psychoanal* 45: 1045–1066
- Rickman J (1957) *Selected contributions to psychoanalysis*. Basic Books, New York
- Richards AD (2003) Psychoanalytic discourse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A plea for humility. *J Am Psychoanal Assoc* 51 (Suppl): 73–88
- Ricoeur P (1970) *Freud and philosophy*.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London. Fr: (1965) *De l'interpretation*. Seuil, Paris
- Riviere J (1936) On the genesis of psychical conflict in earliest infancy. *Int J Psychoanal* 17: 395–422
- Roth G (2001) *Fühlen Denken Handeln. Wie das Gehirn unser Verhalten steuert*. Suhrkamp, Frankfurt
- Rothstein A (1983) *The structural hypothesis.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Rubinstein BB (1967) Explanation and mere description. A metascientific examination of certain aspects of the 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motivation. In: Holt RR (Ed) *Motives and thought. Psychoanalytic essays in honor of David Rapaport* (Psychological issues, vol 5, no 2 3, monograph 18—19).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pp 18-77
- Rubinstein BB (1972) On metaphor and related phenomena. *Psychoanal Contemp Sci* 1: 70-108
- Rubinstein BB (1980) The self and its brain. An argument for interactionism. By Karl Popper and John C. Eccles. *J Am Psychoanal Ass* 28: 210-219
- Rudolf G, Grande T, Dilg R, Jakobsen T, Keller W, Oberbracht C, Pauli-Magnus C, Stehle S, Wilke S (2002a) Structural changes in psychoanalytic therapies – The Heidelberg-Berlin Study on long-term psychoanalytic therapies (PAL). In: Leuzinger-Bohleber M, Target M (Eds) *Outcomes of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 – Perspectives for Therapists and Researchers*. Whurr, London, pp 201–222.
- Rycroft C (1966) *Psychoanalysis observed*. Constable, London
- Sabshin M (1985)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iatry. Models for potential future relations. *J Am Psychoanal Assoc* 33: 473–491
- Sackett DL, Rosenberg WMC, Gray JAM, Haynes RB, Richardson WS (1996) Evidence-based medicine: What it is and what it isn't.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12: 71-72
- Sagi-Schwartz A, Van IJendoorn M, Grossmann K, Joels T, Grossmann K, Scharf M, Koren-Karie N, Alkalay S (2003) Attachment and traumatic stress in female holocaust child survivors and their daughters. *Am J Psychiatry* 2003 160: 1086–1092
- Sandell R, Carlsson J, Schubert J, Grant J, Lazar A, Broberg J (2006) *Therapists' therapies:*

- the relation between training therapy and patient change in long-term psychotherapy and psychoanalysis. *Psychother Res* 16: 306-316
- Sandell R, Lazar A, Grant J, Carlson J, Schubert J, Broberg J (2006) Therapists' attitudes and patient outcomes: III A latent class (LC) analysis of therapies. *Psychol Psychother* 79: 629-647
- Sandell R, Lazar A, Grant J, Carlson J, Schubert J, Broberg J (2007) Therapists' attitudes and patient outcomes: II Therapist attitudes influence change during treatment. *Psychother Res* 17: 201-211
- Sandler J (1982)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therapy. The training analyst's dilemma. In: Joseph ED, Wallerstein RS (eds) *Psychotherapy. Impact on psychoanalytic training. The influence of practice and theory of psychotherapy an education in psychoanalysis* (Int Psychoanal Assoc, monograph series, no 1).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New York, pp 39-47
- Sandler J (1983) Reflections on some relations between psychoanalytic concepts and psychoanalytic practice. *Int J Psychoanal* 64:35-45
- Sandler J, Dreher AU (1996) What do psychoanalysts want? The problem of aims in psychoanalytic therapy. Routledge, London, New York
- Schachter J (2002) *Tranference. Shibboleth or albatros?* Analytic Press, Hillsdale NJ
- Schafer R (1976) *A new language for psychoanalysis*.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 Schafer R (1983) *The psychoanalytic attitude*. Basic Books, New York
- Schafer R (1985) Wild analysis. *J Am Psychoanal Assoc* 33:275-299
- Schafer R (1990) The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 *Int J Psychoanal* 71: 49-52.
- Schafer R (2005) Conflict: conceptualization, practice, problems. *Psychoanal Q* 74: 47-63
- Schachter J, Kächele H (2007) The analyst's role in healing: Psychoanalysis-PLUS. *Psychoanal Psychol* 34: 429-444
- Scharff J (2002) Zur Zentrierung auf innere und äußere Faktoren. *Psyche – Z Psychoanal* 56: 601-620
- Schepank H (1987) *Epidemiology of Psychogenic Disorders. The Mannheim Study - Results of a Field Survey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Springer, Berlin -. Heidelberg - New York
- Schleiermacher FDE (1959[1819]) *Hermeneutik*. In Kimmerle H (Ed) *Fr. D. E. Schleiermacher Hermeneutik. Nach den Handschriften neu herausgegeben und eingeleitet von Heinz Kimmerle (Abhandlungen der Heidelberg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Jg 1959, 2. Abh)*. Winter, Heidelberg
- Schlesinger HJ (1974) Problems of doing research on the therapeutic process. *J Am Psychoanal Assoc* 22: 3-13
- Schmidt-Hellerau C (1995) *Lebenstrieb & Todestrieb, Libido & Lethe. Ein formalisiertes, konsistentes Modell der psychoanalytischen Trieb- und Strukturtheorie*. Verlag Internationale Psychoanalyse, Stuttgart
- Schorske C (1980) *Fin de Siecle in Vienna*. Knopf, New York
- Shane M, Shane E (1980) Psychoanalytic developmental theories of the self. An integration. In: Goldberg A (Ed) *Advances in self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New

- York, pp 23–46
- Shedler J (2010) The efficacy of psychodynamic psychotherapy. *Am Psychol* 65: 98–109
- Sherwood M (1969) The logic of explanation in psychoanalysis.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 Smith H (2005) Analysis of conflict: 13 contemporary views. Editor's introduction. *Psychoanal Q* 74: 1–4.
- Spence DP (1981b) Psychoanalytic competence. *Int J Psychoanal* 62: 113–124
- Spitz RA (1965) The evolution of dialogue. In: Schur M (ed) *Drives, affects, behavior*, vol 2.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New York, pp 170–190
- Spitzer M (2004) *Selbstbestimmen. Gehirnforschung und die Frage: Was sollen wir tun?* Spektrum Akademischer Verlag, Heidelberg
- Spruiell V (1983) Kuhn's "paradigm" and psychoanalysis. *Psychoanal Q* 52: 353–363
- Stern D (1985) The interpersonal world of the infant: A view from psychoanalysis and developmental psychiatry. New York, Basic Books
- Stern D (2005) Intersubjectivity. In: Person ES, Cooper AM, Gabbard GO (Eds) *Textbook of psychoanalysis*.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Washington DC, pp 77–92
- Stern DN, Sander LW, Nahum JP, Harrison AM, Lyons-Ruth K, Morgan AC, Bruschweiler-Stern N, Tronick EZ (1998) Non-interpretative mechanisms in psychoanalytic therapy. *Int J Psychoanal* 79: 903–921
- Stone L (1981a) Notes on the noninterpretive elements in the psychoanalytic situation and process. *J Am Psychoanal Assoc* 29:89–118
- Strachey J (1934) The nature of the therapeutic action of psycho-analysis. *Int J Psychoanal* 15: 127–159
- Strenger C (1991) Between hermeneutics and science. An essay on the epistemology of psychoanalysi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Madison
- Sullivan HS (1953) 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psychiatry. Norton, New York
- Sulloway FJ (1979) Freud, biologist of the mind. Beyond the psychoanalytic legend. Basic Books, New York
- Sutherland JD (1980) The British object relations theorists. Balint, Winnicott, Fairbairn, Guntrip. *J Am Psychoanal Assoc* 28: 829–860
- Target M (2003) Über psychoanalytische Ausbildung: eine Literaturübersicht. *Forum Psychoanal* 19: 193–210
- Thomä, H. (1981b) Über die Identifizierung des Patienten mit dem Psychoanalytiker und seinen Funktionen. In: *Schriften zur Praxis der Psychoanalyse: Vom spiegelnden zum aktiven Psychoanalytiker*. Suhrkamp, Frankfurt, S 122–139
- Thomä H (1983a) Erleben und Einsicht im Stammbaum psychoanalytischer Techniken und der "Neubeginn" als Synthese im "Hier und Jetzt". In: Hoffmann SO (Ed) *Deutung und Beziehung. Kritische Beiträge zur Behandlungskonzeption und Technik in der Psychoanalyse*. Fischer, Frankfurt am Main
- Thomä H (1983b) The position of psychoanalysis within and outside the German university. *Psychoanalysis in Europe. Bull Eur Psychoanal Fed* 20—21:181–199
- Thomä H (1983c) Conceptual dimensions of psychoanalyst's identity. In: Joseph ED, Widlöcher D (eds) *The identity of the psychoanalyst* (Int Psychoanal Assoc, monograph



- series, no 2).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pp 93—134
- Thomä H (1993) Training analysis and psychoanalytic education: Proposals for reform. *Annual of Psychoanalysis* 21: 3-75
- Thomä H (1999) Zur Theorie und Praxis von Übertragung und Gegenübertragung im psychoanalytischen Pluralismus. *Psyche – Z Psychoanal* 53: 820–872
- Thomä H. (2001a) Intersubjektivität und Bifokalität der Übertragung. In Bohleber W, Drews S (Eds) *Die Gegenwart der Psychoanalyse und die Psychoanalyse der Gegenwart*. Klett-Cotta, Stuttgart, S 370–383
- Thomä H (2002) "Sitzt die Angst in den Mandelkernen?" In: Roth G, Opolka H (Eds) *Angst, Furcht und ihre Bewältigung*. bis, Oldenburg, pp 87-123
- Thomä H (2003) Über den klinischen Tod des Metapsychologie und den Wiederbelebungsversuch von Cordelia Schmidt-Hellerau. *Psyche – Z Psychoanal* 57:1099–1107
- Thomä H (2005) Future psychoanalysts without special professional identity – an utopian dream? *Int Forum Psychoanal* 13: 213–236
- Thomä H, Kächele H (1975) Problems of metascience and methodology in clinical psychoanalytic research. *Annu Psychoanal* 3:49 119; updated version in Kächele et al. 2009, chapter 2
- Thomä H, Kächele H (1976) Bemerkungen zum Wandel neurotischer Krankheitsbilder. *Psychother Psychol Med* 26: 183–190
- Thomä H, Kächele H (1999) Memorandum on a reform of psychoanalytic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sis News* 8: 33-35
- Thomä H, Kächele H (2007) Comparative psychoanalysis on the basis of a new form of treatment report. *Psychoanal Inq* 27: 650-689
- Thomä H, Grünzig H-J, Böckenförde H, Kächele H (1976) Das Konsensusproblem in der Psychoanalyse. *Psyche - Zeitschrift für Psychoanalyse* 30: 978-1027
- Treurniet N (1983) Psychoanalysis and self psychology. A metapsychological essay with a clinical illustration. *J Am Psychoanal Assoc* 31:59—100
- Trevarthen C (1977) Descriptive analyses of infant communicative behaviour. In: Schaffer HR (ed) *Studies in mother-infant interaction*.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pp 227—270
- Tuckett D (2005) Does anything go? Towards a framework for the more transparent assessment of psychoanalytic competence. *Int J Psychoanal* 86: 31–49
- Valenstein AF (1979) The concept of "classical" psychoanalysis. *J Am Psychoanal Assoc* 27 (Suppl):113—136
- Waelder R (1936) The principle of multiple function. Observations on over-determination. *Psychoanal Q* 5:45—62
- Waelder R (1962) Psychoanalysis, scientific method and philosophy. *J Am Psychoanal Assoc* 10:617-637
- Wallerstein RS (1983) Self psychology and "classical"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The nature of their relationship. *Psychoanal Contemp Thought* 6:553 595
- Wallerstein RS (1988) One psychoanalysis or many. *Int J Psychoanal* 69: 5–21
- Wallerstein RS (1990) Psychoanalysis. The common ground. *Int J Psychoanal* 71: 3-20

- Wallerstein R (1993) Between chaos and petrification: A summary of the 5th IPA Conference on Training. *Int J Psychoanal* 74: 165–178
- Wallerstein RS (2003) The intertwining of politics and science in psychoanalytic history. *J Am Psychoanal Assoc* 51 (Suppl): 7–21
- Weiner H (1979) Freud's project reassessed. By Karl H Pribram and Merton M Gill. *J Am Psychoanal Assoc* 27:215–223
- Weiß H (1999) Die Verabsolutierung der Gegenübertragung: ein neues Gespenst? *Psyche - Z Psychoanal* 53: 894-004
- Weiss J (1993) *How psychotherapy works. Process and technique.* Guilford Press, New York London,.
- Weiss J, Sampson H, The Mount Zion Psychotherapy Research Group (Eds) (1986) *The psychoanalytic process: Theory, clinical observation, and empirical research.* Guilford Press, New York
- Weizsäcker V von (1977[1954]) *Natur und Geist. Erinnerungen eines Arztes*, 3rd edn. Kindler, Munich
- Will H (2001) Was ist klassische Psychoanalyse? *Psyche – Z Psychoanal* 55: 685–717
- Williams P (2005) What is psychoanalysis? What is a psychoanalyst? In: Person ES, Cooper AM, Gabbard GO (Eds) *Textbook of Psychoanalysis.*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Washington DC, pp 189–199
- Winnicott DW (1965) The maturational processe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New York
- Wisdom JO (1956) Psycho-analytic technology. *Br J Philosophy Sci* 7:13–28
- Wisdom JO (1984) What is left of psychoanalytic theory? *Int J Psychoanal* 11: 313-326
- Wolff PH (1971) Review of psychoanalytic theory in the light of current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J Am Psychoanal Assoc* 19:565 576
- Wollheim R, Hopkins J (Eds) (1982) *Philosophical essays on Freu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Wright G von (1994) *Normen, Werte, Handlungen (Norms, values, actions).* Suhrkamp, Frankfurt
- Wurmser L (1977) A defense of the use of metaphor in analytic theory formation. *Psychoanal Quart* 46: 466-498
- Wyatt F (1984) Unnötige Widersprüche und notwendige Unterscheidungen. Überlegungen zur Differenzierung von Psychoanalyse und psychoanalytischer Psychotherapie. *Psychother Psychol Med* 34: 91–96